

REMEMBRANCE

記憶

DOMESTIC EDITION

国内版

Aperiodic Publication

不定期出刊

追忆似水年华
汇聚天下文章
建立交流平台



《记忆》295期

目录

【思想文化】

历史唯物论与历史决定论/张显扬

“歌颂”与“暴露”/王若水

红色、红色文化及其他/唐燕

【百年国史】

毛泽东怕不怕历史？

——整人的动机与功效/单少杰

中国特色的“五七体制”

——读《五八劫》/钱理群

【述往】

1973—1977：我的“二外”记忆（1）/李红云

画说我这一生 /刘海鸥

1. 梦一般的记忆碎片（1947—1951）

2. 排队队，吃果果（1951—1953）

周扬女儿的回忆：苦难人生十二年（三）

——文革后期，渐悟等待/周密

【书摘】

程映红《红潮小史》三篇

1. 从哲学教授到恐怖分子

——毛泽东思想的秘鲁传人冈扎洛

2. 卡斯特罗的成功秘籍

——“我通过纽约时报找到了工作”

3. 卡斯特罗培育超级母鸡和种牛的故事

【更正】

【本刊声明】

【思想文化】

历史唯物论与历史决定论

张显扬

从19世纪40年代中期发端，到1859年马克思以经典形态加以表述，再到1895年恩格斯逝世，整整半个世纪，其间历经几多变化，可是有三个概念始终不变，这就是“决定”“必然性”和“不能跳过”，它们构成了历史唯物论的基本框架和最核心的主题词。把这三个概念连接起来，就是历史过程中的各个社会参数，包括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是一个决定一个的，历史的发展受此必然性支配，因而任何发展阶段都不能跳过。“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规律。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快。”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的这句话，言简意赅，道尽了历史唯物论的精义。

卡尔·波普尔等西方学者把历史唯物论归入历史决定论的范畴，是一点不错的。实际上，列宁就认为马克思的哲学是“决定论”。他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一书中，在与自由主义民粹派分子米海洛夫斯基论战时写道：“决定论思想确定人类行为的必然性，推翻所谓意志自由的荒唐的神话……”一直到今天，只要说到历史唯物论，人们想到的还就是这个历史决定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研究马克思的人，特别是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人，对马克思本人说过的、后来被镌刻在他的墓碑上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句名言，没有不背得滚瓜烂熟的；对同样被归到马克思哲学名下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命题，更是不厌其烦地再三重复。可是，很少有人想到用这两条去衡量一下历史唯物论本身，就好像它是写在天穹上的神谕，是可以超越一切评价标准的。实际上用这两条去衡量一下，就不难发现，

作为决定论的历史唯物论的真理性其实是大可怀疑的。

恩格斯晚年在回忆历史唯物论的发展时说，历史唯物论曾经被用于三个历史层次：在《共产党宣言》中，用于“全部近代史”；在《法兰西阶级斗争》中，用于“一段现代史”；在《新莱茵报》上发表的文章里，用于“当时发生的政治斗争”。这里所说的“用”，是指“用唯物主义观点从一定经济状况出发去说明”历史，也就是“把政治事件归结为最终是经济原因的作用”。简单地说，就是用来“解释世界”。我认为，这样的“用”，即使用得很成功，很得心应手，也不足以证明历史唯物论的真理性。因为，解释得再好，也只是解释而已。解释，只要不把五个W中的四个，即时间、地点、人物和事件弄错，只要没有这些硬伤，是无法证伪的。只有在“改变世界”的实践中取得预期的成功，才能证明我们认识的真理性，因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明确地说，只有社会主义实践，才是检验历史唯物论的真理性的最恰当、最权威的标准。历史唯物论是干什么的呢？是为社会主义提供理论基础的。正如恩格斯所说，历史唯物论是科学社会主义两大基石之一。有了历史唯物论，有了剩余价值学说，社会主义就从空想变成科学。因此，只有通过社会主义实践的检验，历史唯物论的真理性才能最终得以确立。在这个意义上，我可以这样说，在马克思的时代，历史唯物论还没有经过严格意义上的检验，因为马克思、恩格斯主要还是在理论领域活动。恩格斯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中说，马克思对1848年法国革命的论述，“光辉地经受住了后来由马克思自己进行的两度检验”。这里所说的“检验”，其实仍不过是“解释”而已。真正从理论到实践的转变，是从20世纪初开始的。

历史唯物论经受住20世纪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考验了吗？20世纪的社会主义实践，有辉煌的进军，也有惨重的失败，其间大大小小的事件发生过无数。而最重要的被认为改变了世界面貌的大事有四件：十月革命的胜利，中国革命的胜利，苏联现实社会主义的失败，中国的改革开放。如果加上发达资本主义世界理应（按历史唯物论之理）发生革命而实际没有发生革命这件事，20世纪的社会主义实践，总共有五件大事。这五件大事应该成为检验历史唯物论的真理性的最重要的尺度。📌

选自张显扬《论历史唯物主义》，载《党文化的基因》未出版。

【思想文化】

“歌颂”与“暴露”

王若水

所谓“歌颂”还是“暴露”的争论之实质，就是允许不允许批评、有没有言论自由的问题。毛清楚地表示，他是鼓励歌颂而不欢迎暴露（批评）的，“对于人民，这个世界历史的创造者，为什么不该歌颂呢？共产党，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应该歌颂呢？”“你是资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无产阶级而歌颂资产阶级；你是无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资产阶级而歌颂无产阶级；二者必居其一。”他用了一种“非此即彼”的两分法，好像所有文艺家不是“资产阶级”的就是“无产阶级”的。那么，有没有农民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文艺家呢？是不是对所有的作家都要按阶级来定性呢？难道作家除了歌颂之外写的就必然是暴露性的东西，那么有没有既歌颂又暴露、既不是歌颂也不是暴露的作品呢？其实，资产阶级作家也不一定只歌颂资产阶级而不歌颂无产阶级。十九世纪欧洲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就是批判资产阶级的。美国记者斯诺写了著名的《西行漫记》，歌颂了中共和边区，可是毛泽东不还是认为斯诺的世界观是资产阶级的吗？

人民、共产党、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是应当歌颂的；可是它们也不是完美无缺的，为什么就批评不得呢？马克思、恩格斯说过，辩证法不承认任何神圣的东西，而毛泽东却把这些东西神圣化了。其实，延安的那些作家并没有说共产党不好，新民主主义不好；否则，他们跑到边区来干什么？他们只不过对某些干部的官僚主义作风和某些制度上的缺陷提出了批评，认为革命队伍里不应该有这种东西。而在毛泽东看来，批评共产党的某些干部就是批评共产党，就是批评无产阶级、工农兵、人民大众，就是立场有问题。

毛泽东一方面贬低知识分子，贬到一文不值的地位；另一方面又抬高“工农兵”和“人民大众”，抬高到实际上不容批评的地位。我说“实际上”，是因为毛泽东没有说人民大众不能批评；相反，他承认，人民大众也是有缺点的，是需要批评的，甚至可以讽刺。但是他说，这些缺点应当“用人民内部的批评

和自我批评来克服”。他警告说，这种批评“必须是真正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用保护人民、教育人民的满腔热情来说话。如果把同志当作敌人来对待，就是使自己站在敌人立场上去了”。在毛看来，对敌人的讽刺和对人民的讽刺是不一样的。怎样区别这两者呢？难矣。说是可以批评，可又左一个必须这样批评，右一个必须那样批评，使人感到要符合这种所谓正确的批评实在太为难、太冒险（谁不害怕“站在敌人立场上”这一罪名呢），于是还不如不批评的好。今天来看王实味和丁玲的杂文，都感到他们是抱着满腔热情来写批评文字的，但他们的遭遇是什么呢？📖

选自王若水：《整风压倒启蒙：“五四精神”和“党文化”的碰撞》

原载《当代中国研究》2001年第4期（总第75期）

【思想文化】

红色、红色文化及其他

唐燕

—

颜色本无优劣之分，“红橙黄绿青蓝紫”除了它们的本意之外，其各自的象征意义有着鲜明的文化内涵。不同的地理环境、历史背景、文化习俗、宗教信仰和心理定式使不同民族对同一颜色有着不同的认知、偏爱或禁忌，具有明显的民族文化特征。

中华民族一向喜好红色，源于我们祖先对太阳、火焰和血液的原始崇拜。太阳使万物生长；火焰能驱赶野兽，烹熟食物；血液代表生生不息的宝贵生命。它们所呈现的红色象征热情、奔放、朝气、积极、力量、希望，代表吉祥、喜庆、幸福、富贵、荣华、美丽等等，久而久之先民们便把对这三者的喜好和敬畏转化成红色崇拜。

孔子说红色是大雅之色，红色自周朝起即代表特权和正统。从古代皇帝的“朱批”、大红官印，到法院给布告上死刑犯名字打的“红叉”，乃至现在的政府“红头”文件，都体现着至高无上的权威。

红色也有避邪之意。中国民间流传着这样的故事：每年腊月三十怪兽“夕”总闯入民宅伤害人畜，灶王爷便请“年”来除“夕”。因为“夕”最怕红色、火光和响声，“年”就一边双手挥舞红绸，一边命人点火烧竹子。不断舞动的红绸、烧竹子时的火光加上噼噼啪啪的巨响就把“夕”吓跑了。据说，中国人过年时穿红衣、贴红联、挂红灯和放鞭炮的习俗即由此演变而来。中国宫廷、庙宇和大户人家宅第的那些红墙、朱门、彤柱，既为了喜庆也为了避邪。

红色还代表斗争和革命。马克思最喜欢的颜色即红色，“第一国际”的标志也是红色。列宁把与沙皇白卫军对抗的布尔什维克军事武装称作“红军”。井冈山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以俄为师”，也将其军队命名为“红军”。我国的国旗以鲜红为底色，象征革命，寓意革命烈士的鲜血染成。红色是中国的国色，“红色中国”是社会主义中国的专有名词。

文革时期，红色更被赋予了浓厚的政治色彩，代表革命、混乱和暴力。直到今天，只要一提到红八月、红卫兵、红色造反、红色恐怖、红海洋，就立刻使人联想到血腥和残暴。

经过世世代代的传承、演变、沉淀和升华，红色情结一直流淌在中国人的血液里，遗传在中国人的基因中，“中国红”是中国人的精神皈依。

二

“红色文化”这个词组大约在本世纪初问世并开始流行，还派生出红船、红都、红歌、红演、红色记忆、红色精神、红色主题、红色江山、红色旅游、红色基因、红色资源、红色经典、红色教育、红色产品、红色官窑、红二代、红色资本家等等，虽然这些词汇当时听上去颇新颖，但其词义各具有丰富的历史内涵。

红色文化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长期革命斗争中，将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华民族喜欢崇尚红色的文化传统相结合的产物。它是我国民主革命时期的文化主流，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得以继承、丰富和发展，是当前弘扬的主流价值观。

马列主义信仰、共产主义理想、爱国主义、集体主义、英雄主义、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等等是红色文化的精髓，弘扬红色

文化有益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有助于对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也有利于培养国人的爱国情感和民族精神。

红色文化的兴起与人们的怀旧情绪，特别与信仰的缺失密切相关，它唤起了人们对革命传统文化的怀念和追忆，部分满足了人们的精神追求，也推动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的建设。

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不再以阶级斗争为纲，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定改革开放为基本国策，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保持现有秩序的历史连贯性基础上超越了左右，努力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融入世界，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大多数西方人看来，中国不再是冷战时期的红色帝国了。

中华农业文明从最初的开疆拓土到后来的精耕细作，从开始的不断扩张到逐步守成、有序和包容，使全社会形成了一套尽量避免纷争和战乱的、较为稳固的自我调节系统。尽管我国的改朝换代大多通过暴力的农民起义，但是“和谐中庸”“和为贵”一直是中华民族固有的传统文化基因。然而毋庸置疑，不同于中华传统文化稳健守旧的主基调，红色文化既是革命精神和优良传统的表征，也囊括了以血腥暴力反抗旧制度旧思想和旧文化所产生的负面影响，而且与极左错误和文革危害紧密相联。

所以我们在弘扬红色文化的同时，非常必要警惕极左思潮和阶级斗争意识的回归，防止被反对改革的势力利用。这就需要在红色文化与极左思潮之间有一个理性的界定和科学的切割，以防止随时可能被激活的文革思潮卷土重来。最近出现的“将中国核弹头扩大至1000枚”“中国将不惜一战。中国即使牺牲十亿人口，仍然是世界上人口第二多的大国”之类的反人类叫嚣，以及“世界上只有两个国家，一个叫中国一个叫外国”“双赢就是中国赢两次”等等的狂妄鼓噪，已经给人形成了中国又退回到血腥暴力时期的印象。

三

红色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机组成部分，弘扬红色文化使我们得以利用红色资源和发扬红色传统培养并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阐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12词“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

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所表达的也正是红色文化为之奋斗的目标和蓝图。

西方文明则与悠久的基督教文化一脉相承，普世价值观源于基督教，基于“人性恶”。为了制约“人性恶”，保障人人生而平等和基本权利的实现，西方社会逐渐形成了一个适应世俗社会的普世价值体系。这个体系经历了从反封建到资本主义成熟期上千年的发展历程，超越了民族、种族、国界和信仰，是人类文明的共同重要成果。

“普世价值”这一概念源于德国神学家孔汉思在1990年出版的《全球责任》一书中首先提出的“普世伦理”构想，后被一些西方学者扩充、论证为“普世价值”，它是为了人类社会能和平相处、避免战乱，各宗教、政党、组织、国家、地区之间能保持道德上的一致性而设置的衡量是非善恶的最低标准和底线，一些学者把普世价值归纳为“自由、平等、人权、正义”“和平、公平、诚信、友好”，普世价值的最高境界是“天下一家、众生平等、万物一体、敬天爱人”。

这个归纳与我们概况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12个词不仅不矛盾，还有不少重合之处。至于其中所阙如的“民主”和“法治”，不被西方人认为是普世价值本身，而是实现普世价值的工具：“民主”是保障“平等”和“自由”的程序，“法治”是保障“人权”和“自由”的手段。而“民主”和“法治”只能保障公权力的合法性，不能保证解决所有的社会问题，包括不能保证民主选举一定会选出好人。正因为如此，除罪犯外的任何社会成员都必须有“自由”、有“人权”。

可是，“自由”和“人权”被我们有些中国人说成是西方人的发明和专利，这显然不是事实。

我们的核心价值观12词中的第5个便是“自由”。上世纪30年代，田汉作词、冼星海作曲的“红歌”《热血》里就唱道：“谁愿意做奴隶，谁愿意做马牛？……我们为了博爱、平等、自由，愿付任何代价，甚至我们的头颅！”可见，“自由”早就是我们中国人的追求。事实上，任何人，无论什么族裔，处于何种文化背景和政治环境，都有对“自由”的向往和追求。

当然，中西方对自由的理解是有偏差的。西方的自由观建立在基督信仰之上，西方人相信上帝创造了平等的个人，并赋予了所有人平等的权利，所以他

们非常注重实现个人自由、个人价值和个体的利益。又因为每个人的人生意愿和计划不同，为了确保其根本目标和利益的实现，“自由”还被赋予了优先性。

而我们中国人则注重在“天人合一”“性善论”传统文化基础上，通过自身的道德修养和道德自律实现内心的自由，以及在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中获得必然的自由。由于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政治追求“大一统”，所以集体主义成为维持社会秩序的价值目标。中国人没有西方三权分立并彼此制衡的自由主义传统，也没有契约精神和规则意识。显然，这些致命的“没有”是我们的短板，需要向西方学习借鉴。

至于“人权”，中国是1948年12月10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的主要起草国之一，对这一宣言的制定和通过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时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副主席张彭春先生的主张下，儒家“仁”的思想被写入了该宣言的《序言》；他强调人的“权利”与“义务”必须相结合，也被纳入了《宣言》第29条。此外，张先生的另外两项主张也被写入了《世界人权宣言》：一是《宣言》应具有开放性，以便于各种文化和各宗教派系能够以各自的方式和角度对其解读；二是经济权利也是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社会经济权利和公民政治权利应该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刘轶圣：《被遗忘的民国名流张彭春》）

新中国在1971年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后，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拥护《世界人权宣言》里强调的各项基本权利。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积极参与国际人权活动，迄今为止中国加入的国际人权条约和议定书已达27项。中国人民越来越认识到，维护并行使自己与生俱来的生存的权利、免于恐惧的权利、生命的权利、免于匮乏的权利、思想自由和表达自由的权利，是推动我国民主化进程的重要前提和保障。和“自由”一样，“人权”并非西方人的专利。

然而，在人权问题上我们仍与世界大多数国家存在着认识上和做法上的差异和差距，以至于最近发生了西方多个名企以中国人权为由抵制新疆棉的事件。在人权的普遍性原则已被全世界公认，世界各国与人权有关的理念和思想正在逐步统一的当下，我国的人权观并未被大多数国家认同，这是我们应该正视的。

还有人认为，人类没有绝对的普世价值，普世价值是相对的，是西方的专属，对普世价值的宣扬是对西方文化侵蚀的放纵，中国应该用自己的价值观对

抗西方的话语霸权。

目前，虽然我国已达到世界第二的经济总量，但是经济的高速发展不会必然产生优秀的价值观，经济的崛起也代替不了文化的崛起。最近的形势准确无误地表明，仅仅经济上的崛起是靠不住的，随时都有崩盘的危险，只有在文化上崛起了才是真正的崛起，才称得上强国。所以我们必须在增强文化软实力上狠下功夫，对不同民族的先进文化首先要有尊重和敬畏之心，进而努力汲取其中的优秀人文精神资源，兼收并蓄博采众长，以使我们的文化既保持中国的优良传统，又具有人类的普遍价值意义，以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为此，我们必须摆脱各种旧的思想观念尤其是极左思潮的干扰，营造出一个尊重常识、尊重理性、宽松开放的舆论环境。

综上，在弘扬红色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同时，我们应该也必须接受并践行普世价值，任何站在普世价值相对主义的立场上，反对和排斥普世价值的想法和做法都是落后和短视的表现。❏

【百年国史】

毛泽东怕不怕历史？

——整人的动机与功效

单少杰

笔者曾在拙文《略谈中国史学双重职能》中引述过刘少奇的两段话：

1962年7月一天，中南海游泳池畔，毛泽东质问刘少奇：为什么不顶住邓子恢、陈云等人的右倾举动？刘一向顺从毛，但此次竟“有些动感情”地顶了毛：“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

刘少奇做错事时害怕历史，受冤屈时也寄希望于历史。他晚年爱说这样一句话：“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

读者可能会由此而追问笔者：那么，毛泽东对于历史是持什么态度呢？是不是也像刘少奇那样：或是在做错事时惧怕历史呢？或是在受冤屈时寄希望于

历史呢？

笔者曾就此问题作过长时间思考并形成一些看法，概言之，由于毛泽东和刘少奇所拥有的政治经历不尽相同，故而他们所遭遇的历史问题也不尽相同：

毛泽东有类似于刘少奇因做错事而“惧怕历史”的问题，但无类似于刘少奇因受冤屈而“寄希望于历史”的问题。

就中共高层权力角逐最终结果来看，毛泽东无疑是最强者，是最善于整人的人，所以也就不存在因挨整而受冤屈的问题，以及不存在因受冤屈而“寄希望于历史”的问题。

诚然，毛泽东在其政治生涯中也曾挨过整，也曾受过冤屈。例如，他在江西苏区时就被指责为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并被奚落为一个狭隘经验主义者，即一个没有出过国留过洋而只擅长在山沟沟里打转转的人，一个没有读过许多马恩列斯原著而只熟悉诸如《三国》、《水浒》那类旧书的人。

然而，毛泽东已经把自己挨整的事给摆平了，甚至平过了头。例如，他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就已经把那些整过他的人都给整治了一遍，甚至把那些虽没有整过他但也没有推崇过他的人都给整治了一遍；已经把自己曾蒙受的冤屈都给雪清了，甚至把自己曾有过的污点也都给洗白了，以至把自己洗成一个没有任何瑕疵的人，一个通体透白并白到匪夷所思程度的人，毋宁说是一个完全超凡脱俗的神。

毋庸置疑，毛泽东在历史上做过许多错事，许多后果极为严重的大错事，比如做过发动“大跃进”致使数千万人饿死的大错事，又比如做过发动“文化大革命”致使数万人歇斯底里的大错事。

那么，毛泽东会不会因此而惧怕历史呢？

笔者曾就此问题作过肯定性论述，即在《略谈中国史学双重职能》一文中指出，毛泽东临终前不久关于“我一生办了两件事”的谈话，就是在很认真地“推测他死后人们将怎样评价他，并显得有些放心不下”。

笔者也曾向李锐先生提出过“毛泽东怕不怕史”这一问题。李先生听后眼睛一瞪说：“他怎么不怕史？他怕，非常怕！你想想，他搞文化大革命，搞了那么长时间，做了那么多坏事，却没有留下许多墨迹、许多他的亲笔墨迹。他这是因为什么？还不是因为怕史！怕留下他做坏事的亲笔记录，怕让后人骂。”

可问题是，毛泽东本人毕竟没有说过自己惧怕历史的话，至少就现已公布的文献资料来看，他没有能像刘少奇那样直截了当地说过自己惧怕历史的话。

毛泽东熟读中国史书，自是能够读出中国史书有一重要功用，就是很在意褒贬人物，既很在意褒扬那些行了大善的人，使之流芳百世；也很在意贬斥那些作了大恶的人，使之遗臭万年，故能让那些“乱臣贼子”和“无道天子”感到惧怕。所以，毛泽东很明白，像他这种执掌过大权且又做出过重大事故而必上史书的人，如果坦言自己非常惧怕历史，就似乎在对号入座了，承认自己做了大恶，至少显得自己有做了大恶的嫌疑。

不过，毛泽东虽没有说过自己惧怕历史的话，但不等于他不惧怕历史。要识透像毛泽东这种言辞信用度不大高的政治人物，关键不是要听其言，而是要观其行，即通过观察其行为方式来确证其内心想法。

当然，这种确证隐有一个前提，即毛泽东的行为与毛泽东的意图有着高度的相关性，故可以从他做了什么中看出他想了什么。依据这一求证理路，笔者侧重考察了毛泽东作为执政者的一种最具有标志性的行为方式，即整人方式。可以说，此公入主北京后所做的最用心也是最重要的事莫过于整人了，整的主要是本党人士，尤其是本党高层人士。

这种整人方式通常都少不了有这样两个手法：一是要迫使所有手下人都必须参与整人；二是要迫使所有挨整者都必须写出检查。这两个手法都不仅有着现实方面的功用，而且有着历史方面的效能：

前一个手法能够让那些参与者都担上与毛泽东同案的责任，从而有利于掩饰毛泽东的历史形象，——让他们都因有着同案者身份而不愿向历史作证，不愿全盘说出毛泽东整人的详情。

后一个手法能够让那些挨整者都立下对毛泽东有利的字据，从而有利于粉饰毛泽东的历史形象，——让他们都言之凿凿地向历史作证，誓言自己是完全错误的而毛泽东是完全正确的。

从毛泽东所使用的这两个整人手法所具有的效能中，可以看出此整人者还是很在乎历史的，很在乎自己将会有个什么样的历史形象：既很注意去掩饰它，尽量设法去模糊那些对自己不利的历史记述；也很注意去粉饰它，尽量设法去收存那些对自己有利的历史记录。简言之，此整人者还是惧怕历史的。📌

【百年国史】

中国特色的“五七体制”

——读《五八劫》¹

钱理群

1958年1月26日——2月16日，在四川省委直接布置与领导下，首先省城成都都在应届高中毕业生中开展了“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运动”，以后又推广到全省各专州、各县。据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批转中共成都市委宣传部《关于中等学校继续深入开展整风运动的意见》，运动主要采取“大鸣、大放、大字报、大争辩”的方式，“对于放出来的反动言论或反社会主义分子，要在学生中当作典型思想认真地加以批判，并列为操行评语内容，作为这个学生升学、就业审查的内容”。²运动的结果，划为四类（“立场反动，有一系列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和三类（“立场动摇，认识模糊”³）的中学生一律以“操行不及格”为由，严禁录取高校。四类则定为“反对社会主义分子及坏分子”（又称“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分子，坏分子”），明确为“敌我矛盾”，⁴“根据中央关于高等学校右派分子处理的指示精神”进行处理，⁵有的遣返农村，劳动教养，有的则和三类学生及所谓“家庭与社会关系复杂”的学生一起分到基层生产单位“锻炼改造”，“不给予干部和工人称号，一律叫试用人员”，并明确“限制使用”：“绝对不能分作党团、人事、保卫、计划、财务和重要业务工作”，“不能提拔选送入学，个别培养”，“政治上应时时对他们提高警惕”⁶。这样的“限制使用”的“变相劳改”的高中毕业生有3200人，⁷而当年四川全省高中毕业生不到一万人。也就是说，

¹ 《五八劫：一九五八年四川省中学生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纪实》，王建军等编，民间刊本。

² 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批转中共成都市委宣传部《关于中等学校继续深入开展整风运动的意见》（1957年11月27日），《五八劫》，267页。

³ 《中国共产党重庆市普通中学委员会关于对高、初中毕业生进行排队通知》（1958年6月13日），《五八劫》，374页。

⁴ 《成都市高中毕业生寒假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总结报告之二》（初稿，时间不详），《五八劫》，345页。

⁵ 《成都市高中毕业生寒假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总结报告之一》（1958年3月1日），《五八劫》，338页。

⁶ 《四川省林业厅关于1958年未被高等学校录取的应届高中毕业生125人工作分配通知》（1958年9月17日），《五八劫》，378页。

⁷ 《省委组织部召开的研究58高中毕业生分配问题的一次会议记录》（1958年9月5日），《五八劫》，376页。

1958届四川高中毕业生中至少有三分之一以上，因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被诱发出的言论，不但被剥夺了上大学的权利，而且成为“政治贱民”，受到了“准专政”。而一些县市还将运动扩大到初中，被划为“反社会主义分子”的学生中，年龄最小的只有13岁。¹

如黄一龙先生在《跋〈五八劫〉》里所说：“这是一场有组织有领导的对未成年人的政治迫害，它直接间接导致若干幼小生命的终结，更夺走了成千上万孩子至少二十年宝贵的生命，其性质正如对摇篮中的婴儿实行集体谋杀”。因此，黄一龙先生将五十年前发生在四川的这一历史悲剧，称为“摇篮惨案”：“处心积虑，撒饵下套，一个政府对自己治下的小孩子下毒手，把他们扼杀在摇篮里”。

悲剧更在于，“没有抵抗，没有哭泣，整个社会默默地看着自己的儿女被‘自己的’政府在摇篮里谋杀”。“这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可悲最可耻的一次投降”，“此情此境，只有千百个赤裸的母亲怀抱自己的婴儿默默走进纳粹的毒气室，可与相比”。

我们再不能沉默，我们必须和这些受难者一起，来“追问‘摇篮惨案’”²，追问：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这一切，意味着什么？

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反社会主义分子”

从表面上看，这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而非“反右运动”。在正式文件里，也明确规定：“不搞反右斗争”，³所以运动中被划成四类的中学生也不叫“右派”，而称“反社会主义分子”或“反动学生”。

但仔细考察，却并不这么简单。

首先提出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是毛泽东。他在1957年7月反右运动刚开始时，就发布指示：“民主党派，教育界，新闻界，科技界，文艺界，卫生界，工商界，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各阶层，手工业工人和其他城乡劳动者，都应当进行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分期分批逐步推行”。他特别强调：“我赞成迅即由中央发一个指示，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批判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批判某些干部的本位主义思想，批判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和个人主义思想，打击地富的反革命行为。其中的主要锋芒是向着

¹ 《编者按》，《五八劫》，381页。

² 黄一龙：《追问“摇篮惨案”——跋〈五八劫〉》，《五八劫》，240—241页。

³ 中共成都市委宣传部：《关于寒假期间集中高中毕业生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意见》（1958年1月28日），《五八劫》，265页。

动摇的富裕中农，对他们的资本主义思想进行一次说理斗争”。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特意指出：“农村中也要先让农民‘鸣放’，即提意见，发议论。然后择其善而从之，其不善者则批判之”。¹

毛泽东提出要在农民以及工人中进行社会主义教育，是建立在他的下述分析和判断基础上的：“现在，全国究竟有多少人不赞成社会主义？我和许多地方同志摸了一个底。在全国总人口中间，大概有百分之十的人，是不赞成或反对社会主义的。这里包括地主阶级，富农，一部分富裕中农，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部分城市上层小资产阶级，甚至个别的工人，贫下中农。六亿人口中的百分之十是多少呢？是六千万人。这个数目不小，不要把它看小了”。他又强调：“在不赞成或者反对社会主义的人里边，最顽固的分子，包括极右派，反革命，还有不搞破坏但很顽固的，可能要带着顽固头脑到棺材里去的，这样的人有多少呢？大概只有百分之二左右。全国人口百分之二是多少呢？就是一千二百万。一千二百万人，如果集合起来，手里有了枪，那是个很大的军队。但是，为什么天下又不会大乱呢？因为他们是分散在这个合作社，那个合作社；这个农村，那个农村；这个

工厂，那个工厂；这个学校，那个学校；这个共产党支部，那个共产党支部；这个共青团支部，那个共青团支部；是分散在各处，不能集合，所以天下不会大乱”。毛泽东最后仍不忘强调：“坚持反社会主义的死硬派，只有百分之二。当然，要注意，刚才邓小平同志讲了，它还是一个很大的力量”。²

毛泽东这一段话，对我们理解1957年毛泽东的部署，关系重大。它内含了三层意思。一是毛泽东心中始终不忘两个数字：“不赞成或反对社会主义的”六千万人与“顽固反社会主义”的一千二百万人，“不赞成社会主义”的，是他要争取的，而“反社会主义”的，则是他要打击、镇压的，底数是“一千二百万”。其二，这样的“不赞成”或“反对”者不仅上层有，民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有，而且底层社会，工人、农民中也有。其三，在毛泽东看来，同时存在于上层和底层的“不赞成社会主义”和“反社会主义”的力量，都是巨大的隐患，必须在它们尚处于“分散”状态时，就地（工厂，农村，学校）解决。这就是

¹ 毛泽东：《一九五七年的夏季形势》（1957年7月），《毛泽东选集》5卷，457页，458页，人民出版社，1977年出版。

² 毛泽东：《坚定地相信群众大多数》（1957年10月13日），《毛泽东选集》5卷，482—483页。

他所说的，“现在我们主动的整风，将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动引出来，使之分割在各个机关各个学校去演习，去处理，分割为许多‘小匈牙利’，而且党政基本不溃乱，只溃乱一小部分（这部分溃乱正好，挤出了脓包），利益极大”。¹

这就是说，1957年下半年，毛泽东当决心来解决他所说的“中国发生匈牙利事件的危险性”时，是有两个部署的，一是发动“反右运动”，主要解决上层社会（民主党派，知识分子，民族资产阶级）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分子”的问题，一是通过“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主要解决基层社会（工人，手工业者，农民，城乡劳动者）的问题，争取其中的大多数“不赞成社会主义”者，打击其中的“反社会主义分子”。²——尽管由于在具体执行中发生了混乱，又规定不在工人、农民中“戴‘反社会主义分子’帽子”，³但指导思想未变，这样的限制规定实际上未得到认真执行。邓小平1957年9月23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扩大的全体会议上代表党中央所作的《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里，就明确提出：要“把斗争方向引导到……—孤立和分化资产阶级右派和一切反社会主义的分子”。⁴这里所说的，正是上层与社会基层的不同打击对象，更准确地说，是不同的命名。

我们从这样的大背景来看四川在高中毕业生中发动的这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尽管自有其我们在下文会详加讨论的“创造性”，但总体是符合毛泽东的上述意图和部署的。不仅早在1957年8月27日，教育部和共青团中央就发出过在普通中学和师范学校中对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的指示，多少有些依据；而且当时的四川省委、成都市委就是将高中毕业生的“社教”与在此之前已经在工人、农民中开展的“社教”同视为“三方面的社教”。据具体主持这

¹ 毛泽东：《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毛泽东选集》5卷，432——433页。

² 按照毛泽东的指示，1957年7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号召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大辩论”；8月8日中共中央发布指示，要在农村开展大规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8月10日《人民日报》又发表题为《在农村中大鸣大放大争》的社论；9月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向全军发布了关于在连队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9月12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在全国工业企业中开展纠正工作作风和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指示；11月1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布在各高校和各级党校开设社会主义教育课程的安排计划。据时为人民大学副校长和党委书记的胡锡奎的说明，大学里的“社会主义教育课是反右派斗争的继续和深入，也是全民大辩论的组成部分”。

³ 中共中央对辽宁省委请示的批复（1958年9月18日）：“在工人中出身成分好，历史清白，但有突出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的人，对这种人只作批判，但不要戴反社会主义分子的帽子。这种人只能是个别的。他们为什么会产生突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一定有其主要客观原因，应该细心地找出这些原因……改造这种人。对于农村中反党、反社会主义突出分子，仍按他们本人的情形加以确立为好……但是不要在农村中去专划一项‘反社会主义分子’，因为这样很容易形成乱戴帽子，特别是对一部分富裕中农容易搞得过头——”。《五八劫》，199——200页。

⁴ 《五八劫》，201页。

次高中毕业生的社教运动的，时为成都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肖菊人回忆，当时的成都市委书记廖井丹就明确指示：“在知识分子中是搞反右派，工人、农民和高中毕业生中的‘反社会主义分子’，通过社会主义教育来搞”。¹

在1957——1958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许多工人、农民、中学生等基层人员被打成“反社会主义分子”这一事实，是可以以中共中央的文件为证的——

“反右派斗争时，在劳动群众中，有一些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的人，被戴上了‘反社会主义分子’的帽子，……—有关单位应宣布取消，并且认真进行团结教育工作”（中共中央文件，中发（61）690号，1961年10月28日）。²

“全省在1957、1958年农村、城镇街道和其他基层单位的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经过群众批判斗争，戴了反社会主义帽子的约有XX万人左右……对工人、农民、独立劳动者、城市贫民、小商贩、乡以下基层干部、武装民警、学生和国营企业单位营业员、售票员中的反社会主义分子，当参照中央1962年‘关于加速进行党员干部甄别工作通知’的精神，由有关单位和基层组织召开会议宣布取消，并认真作好团结教育工作……—对国家供给的区以上机关干部、小学教师、医生和企业单位职工中本人成分资产阶级分子或其他剥削阶级分子的反社会主义分子，以及劳动教养的反社会主义分子，均应参考摘右派分子的‘三个条件’按摘帽处理”（中共四川省委文件总字（62）183号：《关于反社会主义分子问题的请示报告》）。³

“58年以来个别地区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给少数职工戴了一些政治帽子，如反社会主义分子，同四类分子一起集训……”（中共四川省委文件：川发（65）224号，1965年10月21日）。⁴

这里，最引人注目之处，是1958年在基层划“反社会主义分子”的范围，竟是如此的宽，遭遇“五八劫”者，岂只是我们这里讨论的应届高中毕业生！而更让今人吃惊的，是所透露出的数字：单是四川一省，“反社会主义分子”就达“XX万人”，即使按低线算，也应是二十万人左右，那么，全国最少也在二百万。这些年大家一直在讨论，1957年罹难者究竟有多少。有学者认为，1957—

¹ 《揭发材料》（肖菊人）（1968年1月13日），《五八劫》，402页。

² 《五八劫》，200页。

³ 《五八劫》，387——388页。

⁴ 《五八劫》，200页。

—1958年间，大约划了“一百一十万各类右派，六十万反社会主义分子，十万‘右派言论’引致的各色‘分子’”，共计“一百八十万”。¹根据《五八劫》提供的新材料，“反社会主义分子”当不只六十万，总数大概还要增加。但也没有达到毛泽东宣布的“一千二百万”的底线。

为什么向“高中毕业生”开刀？

在应届高中毕业生中大抓“反社会主义分子”，这应该算是以李井泉为首的四川省委的一个“创造”。——其实也不尽然，如果放在1957年反右运动的背景下看，也是事出有因的。

黄一龙先生的分析，一语道破“天机”：“事情的诡谲之处，还在这个（摇篮）惨案的主动一方，其作案的动机依然是恐惧：害怕孩子，害怕孩子长大，害怕自己的‘专政’经不住长大了的孩子摇晃”。结论是：“原来在专制体制下，连专制者自己也没有‘免于恐惧的自由’啊！”²

这里只想作一点申说与发挥。

人们都注意到，在1957年9—10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是一次总结反右派运动的会议；就在这次会议上，对党的八大关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的论断，作出了根本修正，提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由此开始了一个“阶级斗争为中心”的时代。这构成了我们在这里讨论的“五八劫”，以及此后一系列劫难的一个最重要的基本背景。对这一转变的原因，时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薄一波有一个解释：这是因为“毛主席和我们党”感到中国也存在发生匈牙利事件的“现实的危险”，有一种“危机感”。³这是抓住了要害的。这统治的危机感，其实也就是黄一龙先生所说的恐惧感。就我们所讨论的范围而言，在1957年，毛泽东的危机感（恐惧感）主要有二。

一是领导权的危机。这是毛泽东所明言的：“共产党……在多数人（中间派）中的领导权不巩固；有些文教单位还根本没有建立党的领导”。⁴所谓“右派言论”中，最让毛泽东感到刺激的，大概就是罗隆基所说的“现在是马列主义的小知

¹ 丁抒：《反右运动中派发了一百八十万顶帽子》，《五十年后重评‘反右’：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命运》，203页，田园书屋，2007年出版。

² 黄一龙：《追问“摇篮惨案”——跋〈五八劫〉》，《五八劫》，241页。

³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下卷，654页，中共党校出版社，1993年出版。

⁴ 毛泽东：《一九五七年的夏季形势》（1957年7月），《毛泽东选集》5卷，461页。

识分子领导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外行领导内行”这句话，¹它提醒毛泽东，共产党在文化知识上并不占有优势，因而在文化教育界的领导权并不巩固。²这正是毛泽东在反右运动以后所要着力解决的。作为应急措施，就是“从机关中抽调一批可任中学教师的优秀党员到学校任教，以便使这个阵地很快地得到加强”；³《五八劫》一书一再提到的那位从市商业局机关调来担任政治教研组组长和班主任的党员副科长，四处扬言：“是共产党派我来的，反对我就是反对党”，⁴他倒是道出了问题的实质。从长远来看，就是要培养一批“自己的知识分子”队伍。这也是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的夏季形势》里所反复强调的：“工人阶级必须有自己的技术干部队伍，必须有自己的教授、教员、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队伍”，“在这个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宏大新部队没有造成以前，工人阶级的革命事业是不会充分巩固的”。⁵耐人寻味的是，尽管采取了这样一些应急与长远的措施，毛泽东仍然摆脱不了丧失领导权的危机感，以至到了1964年，竟然作出了“我们这个国家有三分之一的权力不掌握在我们手里”的严重判断，⁶这就已经不限于“某些文教单位”，而是全国范围的领导权危机了。因此，也就不是反右或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所能解决，只能用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全面夺权”和“全面专政”的极端手段了。——自然，这都是后话。但其内在的领导权危机感或恐惧感却是从1957——1958年一路发展过来的。

其二是“接班人”危机。中共成都市委宣传部在《关于寒假期间集中高中毕业生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意见》里，一开始就明确规定，“专题鸣放和辩论的中心问题是：应把自己培养成什么样的接班人？”⁷如此强调“接班人”问

¹ 参看朱正：《反右派斗争始末（上）》，124——126页，明报出版社有限公司，2004年出版。

² 四川省委宣传部长杜心源1957年11月16日在《省委地九次宣传工作会议的报告》中，就以成都九中为典型，谈到“六十五个教师中，直系亲属被杀、关、管、斗的就有二十一人，占百分之三十三点三；业务水平在中上以上的二十三人中，中右和右派分子就占十二人，占百分之五十二点一，左派只有三人，占百分之十三”，“这说明目前教师队伍政治情况依然复杂”，“真正够称为无产阶级队伍的教师，在中等学校是少数”，而“没有强大的无产阶级的教师队伍，党在学校的领导权，是不巩固的”。这样的估计，应该是在次宣传工作会议上，最后作出要在中学毕业生中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重要依据。《五八劫》256页。

³ 1957年11月16日四川省委宣传部长杜心源《在省委第九次宣传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五八劫》257页，报告称，这是根据“中央关于知识分子工作三项组织措施的指示”的精神作出的决定。

⁴ 樊宣金：《石室恶梦》，《五八劫》，170页。

⁵ 毛泽东：《一九五七年的夏季形势》（1957年7月），《毛泽东选集》5卷，462页，463页。

⁶ 毛泽东：1964年6月8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报告，转引自郭德宏、林小波：《四清运动实录》，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出版。

⁷ 《五八劫》，265页。

题，是反映了由所谓“右派进攻”所引发的隐忧的。黄一龙先生对此有一个精到的分析：“原来当年引诱民主人士知识分子上钩入瓮的‘反右派运动’，中间出现过一段曲折，不在导演脚本之内。那就是一些大学生忽然从半路杀出来，也要‘帮助党整风’。他们以伟大的‘五四’儿女自命，坚决捍卫公民的宪法权利，坚决‘向一切法西斯蒂开火，叫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这是执政党在全国执政以前教给青年传唱的一首歌曲的名句）……差一点打乱了领袖的战略部署，拆穿了领袖收拾预定敌人的‘阳谋’。于是反右立即‘扩大’，横扫全国大专学校的优秀学生。横扫之后总结教训，知道有独立思想的大学生对于专政十分可怕”。¹用当时一篇批判文章的话来说，就是年轻一代究竟是“革命前辈的接班人”，还是“替资产阶级殉葬的金童玉女”？²其实是更担心成为“掘墓人”，这是执政者的一个心头大患。

毛泽东 1957 年 1 月《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里，谈到石家庄一所学校因就业问题闹事时，就特意指出：“我们高等学校的学生，据北京市的调查，大多数是地主、富农，资产阶级以及富裕中农的子弟，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出身的还不到百分之二十”，“地主，富农，资产阶级，民主党派……—他们老于世故，许多人现在隐藏着。他们的子弟，这些学生娃娃们，没有经验，把什么‘要杀几千几万人’、什么‘社会主义没有优越性’这些东西都端出来了”。³——这里，毛泽东突出了家庭出身问题，而且认定地主、富农、中产阶级是他们子弟的后台，这就开启了下文我们将要讨论的以家庭出身为依据的“阶级分析”，以及动辄追查“学生娃娃”背后的“有胡子的人”的传统。

毛泽东这一时期还特别注意到中学生的动向。他在 1957 年 2 月 27 日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的讲话里，就有这样的一段话：“去年……有十七个学校七千人罢课。全国有五百万中学生，中学校长与党委书记要好好研究如何办好学校，五百万个学生闹起事来，也不好办啊。”⁴

就在 1957 年反右运动前后，发生了两件中学生、中专生“闹事”，而且直接影响到我们这里讨论的高中毕业生的社教运动。这就是 1957 年 3 月的成都第二师范学潮和 6 月 12 日的湖北汉阳一中事件。这两个事件当时都被称为“小匈

¹ 黄一龙：《追问“摇篮惨案”——跋〈五八劫〉》，《五八劫》，241 页。

² 阮铭：《钱伟长和党争夺青年的伎俩》，《中国青年》1957 年 15 期。

³ 《毛泽东选集》5 卷，333 页。

⁴ 转引自朱正：《反右斗争始末》（上），41 页。

牙利事件”，并且上了报，震动了高层和社会。最后都出动了军警，进行了残酷镇压。八十年代都进行了平反，证明前者是官方有意识组织各单位的“左派”，“自称代表工人、农民、市民与学生辩论”而引发，后者完全是无中生有的冤案，是按照反右斗争的逻辑，想象、制造出来的：本来是“一中部分学生为升学率问题而自发地罢课闹事”，却先验地认定是“敌我矛盾性质”的“反革命事件”，然后再去寻找“证据”：先依照“以出身决定立场”的“阶级分析”法，认定富农出身的副校长为学生后台，并由此而炮制一个以其为首的“长胡子”的成年人组成的所谓“幕后操纵学生”的“反革命集团”；再千方百计地追查上层右派的“总后台”，最后生拉硬扯，弄成了一个由湖北民盟主任委员马哲民“策划的‘小匈牙利事件’”。¹这可以说是1957年以后当局处理学生以及社会闹事事件的一个“范例”，其逻辑、想象与手法都一再重复，这是很值得注意的。在四川，成都二师事件就成为当局发动社教运动，向中学生开刀的一个“理由”。省委宣传部长杜心源在其报告中就直截了当地说：“少数（中）学生也可能成为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工具，成都二师闹事就是右派骨干分子彭霖荣煽动的”，²有人认为，成都二师事件是“1958年中学生社教运动的彩排，也是执政当局迫害未成年人的试刀”³，这是有道理的。

事实正是这样，深怀领导权、接班人危机感的执政者，实际上对中学生是不放心的。杜心源部长在他的报告里，就有过这样的分析和估计：“中学生中，有杀亲之仇和直系亲属被关、管、斗的，高中一般占百分之十五至二十，初中占百分之五十。在中等学校曾不断发现极端反动的学生，他们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散布反动言论，张贴反动标语，组织反动集团，煽动学生闹事；有的心怀刻骨仇恨，表面勤学苦练，蓄意报仇。但是某些干部和教师却认为‘青年单纯’‘子女无罪’，对他们姑息，甚至将其中有的人看作‘好学生’‘优等生’”。这几乎是一个“敌情分析”：先从家庭出身上，认定“被关、管、斗”分子的子女、亲属和父母同罪；然后断定中学生中有一批“散布反动言论”（其实不过是有自己的独立见解）的“反动学生”；又将家庭出身不好，而“勤学苦练”的学生，判断为“心怀不满”，“蓄意报仇”，当然是潜伏的，也是更危险的“反动学

¹ 参看吴江：《春寒——二师事件追忆》，《五八劫》177—186页；朱正：《反右运动始末（上）》，303—313页。

² 杜心源1957年11月16日《在省委第九次宣传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五八劫》，252页。

³ 王建军：《试刀》，《五八劫》，194页。

生”；最后将学校干部和老师公认的“好学生”“优等生”，也视为可疑分子，甚至越“优秀”越可疑。这样，就已经把执政者心目中的“不可靠”的中学生，视为“假想敌”了。其逻辑结论，必然如杜心源部长所说，“对于这些人，是首先在劳动中去改造呢，还是用文化武装了他们回转过来反对我们呢？”据说这正是从反右运动中“应该记取的教训”：“大学生的许多右派分子，就是由于中学审查不严混进的”。¹

这就是黄一龙先生所说：“横扫之后，总结教训，知道有独立思想的大学生对于专政十分可怕。而不准可能思想独立的少年进入大学，就逻辑地成为当局的一大要务”。²借用一句战争俗语（当局也确实是当作一场战争来部署、对待的），这叫“战线前移”，把反右斗争

提前到中学，用运动的发动者李井泉的话来说，就是“中学就把它卡住了”，³将危险、隐患消灭于萌芽状态，不惜将治下无辜的孩子视为敌人而扼杀于摇篮之中。这就是向高中毕业生开刀的原由所在。

要建立什么样的“五七”新体制，新秩序？

但也不能将1958年四川中学毕业生中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单地看作是“反右运动”在中学的延续和扩大，它毕竟发生在反右运动以后，是总结、运用、发展了反右运动的经验，从而建立了一种新体制，新秩序，我们把它叫作“五七”新体制，新秩序。其要点，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重新排队，重组阶级队伍

毛泽东在反右一开始，就发布指示：“请你们注意将自己单位的人数，在运动中，按左中右标准，排一下队，使自己心中有数”。⁴在此前后，他都一再强调：“除了沙漠，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一万年以后还会是这样”，⁵“社会上总有左中右”⁶。这次1958年的四川中学毕业生的社教运动，在一开始就在《意见书》里明确提出：要根据学生的“一贯表现，按进步、中间、落后、反动四

¹ 杜心源 1957年11月16日《在省委第九次宣传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五八劫》，259页。

² 黄一龙：《追问“摇篮惨案”——跋〈五八劫〉》，《五八劫》，241页。

³ 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张守愚：《关于一九五八年借社会主义教育为名整高三学生问题》，《五八劫》，392页。

⁴ 毛泽东：《中央关于加紧进行整风的指示》（1957年6月5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6册，492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出版。

⁵ 毛泽东：《事情正在起变化》（1957年5月15日），《毛泽东选集》5卷，428页。

⁶ 毛泽东：《做革命的促进派》（1957年10月9日），《毛泽东选集》5卷，476页。

类进行政治排队，排队的标准是：坚持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能分清大是大非，并积极与反党言行作斗争的划为进步分子；基本上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但对于大是大非缺乏辨别能力，在个别问题上主要是与个人利益相联系的问题上同情和支持右派言论者划为中间分子；对党不满，对社会主义怀疑，在重大政策问题上持有相反观点和立场者划为落后分子；坚决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的划为反动分子。政治排队应在鸣放过程中不断进行审查订正，排队名单应由各校党支部审查”。¹以后又将“进步，中间，落后与反动”，简称为“一、二、三、四类”，一类即“左派”，二类为“中派”，三、四类为“右派”，三类相当于反右运动中的“中右”，属“内部控制”，四类则明确宣布为“敌我矛盾”。

2

应该说，所谓“政治排队”，在某种程度上，是一次重新划分敌我，重新划分阶级。毛泽东早在1926年所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里，就提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³三十年后，他在1957年又再次提出区分“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以此作为发动反右运动，以及以后一系列的阶级斗争的理论依据。⁴其要害正是在国家进入“非革命时期”以后，依然要在公民中划分敌、我、友，划分阶级。而划分的标准，既非马克思主义所强调的经济地位，更不以宪法为依据，首先是思想观点和政治立场、态度，其次是家庭出身——在《成都市高中毕业生寒假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总结报告之二》里，就特意点明：“这次运动中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四类92人，其中出身剥削阶级的62人，占67.4%；直系亲属杀关管斗的55人，占60%，鸣放中大部分严重错误和极端反动的言论，大都出自这类学生的口中，无疑这是阶级本能的反映”，⁵其依据就是前文所说的毛泽东所倡导的“阶级分析法”。

再进一步考察，就可以发现，所谓“思想观点，政治立场、态度”，其核心是是否拥护党，也即是否听党的话；而在反右运动以后又确立了这样的新思维：“所谓党的领导，不是空洞的，而是具体的；承认党的领导，也不是抽象的，

¹ 成都市委宣传部：《关于寒假期间集中高中毕业生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意见》（1958年1月23日），《五八劫》，266页。

² 《成都市高中毕业生寒假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总结报告之二》，《五八劫》，345页。

³ 《毛泽东选集》（一卷本），3页，人民出版社，1964年出版。

⁴ 参看《关于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毛泽东选集》5卷，363—402页。

⁵ 见《五八劫》344页。

而是具体的”，必须落实为“以具体的党组织作为核心”，¹因此，“反对党的组织的负责人，也就是反对党组织；反对共产党，就是反对人民”。²这次中学生社教运动辩论的中心题目之一也是“不服从基层党的领导，能不能叫服从党的领导？”³这样，所谓“思想观点，政治立场与态度”，最后就落实为是否听从基层党组织领导人的话，听话就是“左派”，不听话就是“右派”，也即按对党支部、支部书记的忠诚程度，来划分“左中右”（也即我、友、敌）。政治排队的审查权本来也在党支部手里。仅仅是口头忠诚也不行，还要有行动，这就是前述《意见书》里所说的，要能“积极与反党言行做斗争”才能划为“左派”。也就是鼓励“左派”充当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所说的“用绳子捆绑了劣绅（按：即今天的“右派”），给他们戴上高帽子，牵着游乡”，“发号施令，指挥一切”的“痞子”，也即“革命先锋”。⁴

对所谓“家庭出身”，如果作深入考察，也可以发现，它是服从于“政治立场与态度”的，即使出身于工农，如果不听党的话，特别是基层党组织的话，照样被划为四类。运动《总结报告》中，还特意谈到了出身工农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四类学生”，说他们是“由于个人主义严重发展而走上反动道路”的，举出的一个典型是贫农出身的吴某，他的主要罪状，就是与团组织、学校“对立”，“私自组织壁报《奔放》，攻击学校行政负责同志，而且屡教不改”。⁵四川省成都一中的一位参与运动排队的老师回忆说，班上的高干子女全划为一类。⁶这是一个重要信息：讲家庭出身，真正受到信任与重用的还是革命干部子女，特别是其中的高级干部子女，这是执政者眼里真正可靠的接班人，以至后来有“自己的子女接班，至少不会挖我们的祖坟”的说法。尽管这是后话，但1957年确实是一个开端。

在划分左、中、右的基础上，毛泽东提出要采取“团结左派，争取中间派，孤立右派”的策略，重新组织阶级队伍。⁷在某种程度上，1958年四川中学毕业生的社教运动，就是“重新组织阶级队伍”的尝试。《运动总结报告》就把基本

¹ 吴传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中国青年》1957年13期。

² 疾风：《反对党的某一个组织就不是反党吗？》，《中国青年》1957年18期。

³ 《高中毕业生寒假学习情况简报》（第16号）（1958年2月），《五八劫》，315页。

⁴ 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选集》（一卷本），18页，人民出版社，1964年出版。

⁵ 《成都市高中毕业生寒假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总结报告之二》，《五八劫》，344—345页。

⁶ 原省成一中政治教师贺仲华的揭发材料（1967年12月3日），《五八劫》，118页。

⁷ 毛泽东：《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1957年7月），《毛泽东选集》5卷，464页。

经验归结为贯彻了“依靠进步（一类），团结中间（二类），争取落后（三类），孤立批判反动（四类）”的阶级路线；谈到运动的最大收获，就是“四类分子的面目彻底暴露，学生的阵营就分明了”，左派得到了锻炼，中间派开始“懂得了阶级立场的重要”，各类学生都“更加信任党，热爱党，深深感到党的英明、伟大”，最后归结为绝对服从党的领导：这大概也是运动发动者的用意所在吧。¹

二、建立“大权独揽”的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

如前所说，毛发动反右运动的一个重要理由是“有些文教单位还没有建立党的领导”；因此，建立党的绝对领导权，就成为在反右运动以后最迫切的任务。据杜心源部长在四川省委第九次宣传工作会议上的报告透露，在反右运动中，中共中央曾发布指示，要求各“省委、市委、地委、县委和城市区委书记都要亲自研究一个中等学校和一两所重点小学，农村区委书记要亲自研究一个小学，取得经验，以利于值得全盘工作”。应该说，1958年的中学毕业生社教运动就是以李井泉为首的四川省委的一次试点，加强党对中学教育的领导的一个举措。如杜心源所强调：“党委不管学校，就等于把学校交给资产阶级去领导”。²

问题是，要建立怎样的党的领导？毛于1958年1月南宁会议上，总结了反右运动的经验，提出了“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党委决定，各方去办；办也有决，不离原则；工作检查，党委有责”的党的领导的原则，并且解释说：“集中，只能集中于党委、政治局、书记处、常委，只能有一个核心”。³这里说的“大权独揽”，有两个含义，一是党对国家事务、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一切领域的无所不至的绝对领导与控制，二是各级党委，特别是第一书记对党内外事务的绝对领导与控制。而所谓“绝对领导”，就是不受任何限制与制约的权力的高度集中，即所谓“只能有一个核心”：全国，以党为核心；具体体现为以各级、各部门党委第一书记为核心；最后集中到以党中央主席即毛泽东个人为核心。这就是1957年反右运动以后确立与完善的“大权独揽”的“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

进一步考察，可以发现，这样的集权体制，是落实到社会最基层的，每一个人都被组织在一个固定的单位里（连农民也被纳入生产队），除了党的调动，

¹ 《成都市高中毕业生寒假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总结报告之一》，《五八劫》，333页，329页，332页。

² 杜心源：1957年11月16日《在省委第九次宣传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五八劫》，262页。

³ 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8年1月11日），转引自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76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出版。

是不能自由流动的，形成了所谓“单位体制”，由单位组织代表党和国家对其成员实现从生活，到思想、行动的全面控制。在单位内部，又形成上下有序的等级结构，处在最高等级的是党支部书记，如前文所说，他享有不受限制和制约的，可以任意决定本单位所有的人的命运绝对权力；在书记之下，有支部委员和党员，非党员群众则又有“左”“中”“右”之分，处在每一个等级上的人，对上必须绝对服从，而对下一等级则有在支部指挥下进行迫害的权力。由于“左、中右”的划分是由党支部，特别是支部书记决定的，而且根据毛泽东的两类矛盾理论，“人民”可以随时“变为敌人”，¹“左派”“中间派”都随时可以转化为“右派”，完全取决于书记的意志，因此，左派（以及某种程度上的中间派，以至右派）都会和支部书记之间形成某种人身依附关系。另一方面，这样的集权体制又实行等级授权制，支部书记的权力是上级党组织授予的，因此，每一级的党组织和书记对上级党组织与领导人也同样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依附关系。这样，就形成了一个逐层控制，对上服从对下施暴的等级社会结构。正是在这样的等级社会结构里，形成了一个既得利益集团，在他们的眼里，“大权独揽”，一切服从的体制自然是十分美好的，许多人至今也还神往于那个年代，原因即在于此。

人们在回忆四川省委组织的1958年中学生社教运动时，都要谈到时为四川省委第一书记的李井泉个人的决定性作用，称当时的四川是“李氏独立王国”，正是这样的体制的产物和突出表现。一位参与直接迫害中学生的领导干部在总结历史教训时，说到自己当时“只有对‘上级负责’的观念”，“（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一声令下，（成都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萧某某指挥棒一转”，自己根本不考虑“这样搞会给青年同学带来什么严重后果”，就忠实执行了，“盲目地追随顶头上司，按顶头上司拟定的框框来判断是非，按顶头上司定下的调子来决定敌我”。²这都是体制使然，教训是深刻的。

三、建立以“兴无灭资”为中心的新意识形态

1958年3月，毛泽东有一个重要批示：“有资产阶级的自由，就没有无产阶级的自由；有无产阶级的自由，就没有资产阶级的自由。一个灭掉另一个，只

¹ 毛泽东：《做革命促进派》，《毛泽东选集》5卷，478页。

² 章文伦认罪书（1967年4月3日），《五八劫》，398页。

能如此，不能妥协”，因此要“兴无灭资，无产阶级的自由兴起来了，资产阶级的自由就被灭掉了”。¹应该说，“兴无灭资”正是1957年反右运动以后，最为流行的口号。杜心源在他的报告里，就明确指出：“加强学校的政治思想工作，是学校改革中的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思想政治工作的任务是‘兴无灭资’，灭资产阶级思想，兴无产阶级思想”。²应该说，1958年的中学生社教运动，自始至终都贯穿了这样的“兴无灭资”的精神。

问题是，要“灭”的是什么样的“资产阶级思想”，要“兴”的是怎样的“无产阶级思想”？

在1958年的中学生社教运动中，有一份内部材料：《省成四中58级学生在双反运动中暴露个人主义思想的典型材料汇集》。所谓“双反”就是在“反浪费，反保守”的口号下，号召年青学生“向党交心”，实际就是交代自己不符合党的“无产阶级思想”要求的“资产阶级思想”。那么，交代出来并因此受到批判的，又是些什么思想呢？不妨列举几条：1. “把精神寄托在十八世纪、十九世纪的法国和俄国的反映腐朽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小说上。我爱读法国作家雨果，巴尔扎克，左拉，莫泊桑，俄国作家普希金，莱蒙托夫，以及中国作家闻一多、郁达夫的作品”；2. “我醉心于考大学，热中于解难题”，“我出身贫农，是个遗腹子，我母亲一手撑持两亩薄田，每日两顿掺杂粮的饭。她把希望寄托在孩子们身上，常说‘你将来要找钱呵！’常叫我们为她‘争气’”；3. “必须干出轰轰烈烈的事业，才不枉做人一场。我想成名，对科学有强烈的爱好，从小立下宏大志愿，终身职业就是研究理论物理”；4. “我要用超乎一切寻常人的眼光来看待世界，发表许多新奇的见解”，“我向往着童话的境界”，“我还要掌握宇宙，把宇宙看过究竟，满足个人的求知欲”；5. “我生活的目的是为了作家的地位，巨额的稿费 and 版税，漂亮的小洋房和小汽车，漂亮的理想的爱人”，“我最爱唱的歌是‘五月的风’‘送君’‘初恋’‘望穿秋水’‘花好月圆’‘地上人间’……”；6. “我背着组织和女同学恋爱”，“只要有女同学和我在一起，我就感到幸福和说不出的愉快”；7. 我“追求自由”，“我如学文，一定学鲁迅，正视这惨淡的人生，淋漓的鲜血”，我要“写出社会的不公平”，“攻这些只会背政治条文，带着

¹ 毛泽东：《对上海化工学院一张大字报的批语》（1958年3月22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14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出版。

² 杜心源：1957年11月16日《在省委第九次宣传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五八劫》，252页。

阶级偏见的有色眼镜来衡量别人的文人，打那些被愚弄得昏头昏脑的读者，使他们清醒过来”；8. “我开始对党不满，尤其对一些与我个人相关的政策，如选派留学生，投考高等学校要考察政治条件的问题，以及新教育方针抵触不满”，“党提出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政策时，我的不满加深了……知识分子就是如此，还要什么改造”。材料的整理者将以上思想概括为“个人主义的学习目的”“消极、颓废的人生观”“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与“政治思想反动”四类，并且还作了这样的统计，据说有以上四类“资产阶级思想”的学生分别占学生总数的64.2%，9.5%，5.3%和6.2%。¹

今天来看，这样的材料弥足珍贵，因为它留下了历史的真实记录：在反右运动以后的中国那样一个历史时代，在主流观念中，认为应该批判、抛弃，以至消灭的“资产阶级思想”，竟然包含了如此广泛的范围：不仅有西方和俄国的充满人文主义精神的文学名著，民主、自由、平等、人道等观念，而且也包括年轻人所特有的个人理想，探讨未知世界的好奇心，求知欲，以及对物质的欲望，青春期对男女之情的朦胧向往，甚至还包括了农民的后代希望通过读书改变家庭命运的愿望，而那些独立思考，对社会有批判意识，对现行党的政策持不同意见，对现实存有不满的少年，就更视为心腹之患，必灭之而后快了。

于是我们也就明白，在“灭”了这些“思想”以后，所要“兴”的“无产阶级思想”，就必然是排除了民主、自由、平等、人道的所谓“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念，排除了一切个人欲望、利益、权利，绝对服从，无条件牺牲个人的所谓“集体主义”的观念，放弃了一切好奇心，怀疑精神和创造力的高度统一与僵化的思维，放弃一切独立思考，批判意识，不同意见，自觉充当“驯服工具”的所谓“党的意志高于一切”的意识。——“一切服从于党”，这正是与前述“大权独揽”的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相适应的新意识形态的核心。《成都市高中毕业生寒假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总结报告之一》特地引述了两个学生的反应：一位三类学生说：“我才真正体会到‘离开党一步，就是靠近右派一步’这句话的意思。今后要永远坚信党，听党的话”。另一位四类学生经过批判以后，则写信给同学说：“请从我身上吸取教训吧！生活里，党是我们的灵魂，离开了她，我们将变成一具活尸！”²用这样的反应来总结运动的成效，大概是再合适不过的。所谓“兴

¹ 见《五八劫》，351页，352页，356页，354—355页，358页，36360页，363页，365页，366页。

² 《五八劫》，332页。

无灭资”，目的即在于此。

四、建立新斗争策略：“设置对立面”，制造阶级斗争

但毛泽东并不满足于这样的胜利。他更有深谋远虑。就在反右、整风运动取得基本胜利的1957年10月，他就提出，以后还要不断搞这样的运动：“假使我们后年也不搞，几年不搞，那些老右派，新右派，现在出来的右派，又要蠢蠢欲动；还有些中右分子，中间派，甚至有些左派会要变。世界上有那么怪的人，只要你松松劲，松那么相当的时间，右倾情绪就要起来，不好的议论，右派言论都要来的”。¹问题是如何始终绷紧这根阶级斗争的弦？毛泽东将其在反右运动中已经运用到娴熟地步的“阳谋”经验，再作发展，提出了一个“设置对立面”的策略，²即是说，没有对立面，可以设置，矛盾不尖锐，可以激化，潜伏的矛盾也可以诱发出来，用一切手段制造阶级斗争，既可以将不安全因素消灭于萌芽中，又可以保持社会的紧张气氛，逼使全党全民始终处于“革命状态”。

应该说，李井泉对毛泽东的意图，是心领神会的。他后来和上海的柯庆施等一起得到毛泽东的高度信任与重用并非偶然。毛泽东说过“要定期放火”，并且问：“以后怎么搞呀？”³李井泉于1958年发动中学生社教运动，就是放了一把火，可以说是他对毛泽东策略的创造性的发挥。问题是居然对未成年人设置陷阱，就特别令人发指。但对毛泽东、李井泉这样的政治策略家来说，只要“政治正确”，一切手段都可以采用；而且他们既已经认定这些十七、八岁的娃娃是最危险的“敌人”，就更加不择手段了。

五、建立新的制度：政审、档案等

最后，我们还要提及已经一再引用的四川省委宣传部长杜心源的那个著名报告。正是在这个报告中，提出了“对学生的政治审查，应定为制度”，“初中以上学生应建立档案制度”。⁴

四川省委组织部、宣传部的指示和《教育厅、民政厅、公安厅、高教局、

¹ 毛泽东：《做革命的促进派》（1957年10月9日），《毛泽东选集》5卷，476—477页。

² 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的讲话提纲》（1958年1月16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1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出版。

³ 毛泽东：《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1957年7月9日），《毛泽东选集》5卷，442页。

⁴ 《五八劫》，259页。

人事局关于对报考高等学校考生进行政治审查工作的联合通知》，有三点颇值得注意。

其一，所谓政审，目的是“为了保证（高等学校）新生的政治质量，预防地、富、反、坏、右等分子、混入高等学校”。这里所说的“等分子”，就包括了家庭出身不好、社会关系复杂的中学生。这显然是一种政治歧视，以家庭出身、思想观念与政治的原因而剥夺了年轻人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1957年高教部《关于高考学生政审要求的一些具体意见》甚至规定：“对于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考生要注意从严掌握，政治和现实表现一般的可以不予录取”。

¹其二，在中学生中划分右派与坏分子，并且由公安部门直接介入高校招生，掌握主导权，如本书编者所说，“大概算作我国在世界上的又一创举”，²更是表现了当局的“专政”思维：不仅把一部分中学生视为专政对象，而且在他们看来，教育也是实行专政，专政部门的介入就是必然。

其三，政审的内容，包括了“本人成分、出身、经历，主要社会关系及其亲属的政治面貌和他们在历次社会改革运动中的情况，是否有台、港、澳关系”，这是典型的唯成分论和株连术。同时还包括“本人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对鸣放辩论时的政治态度和在城乡大辩论中的表现，学校政治排队情况”，以及“本人操行评分及对待体力劳动的态度”。³所谓“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到这里可谓“图穷匕首见”：运动不过是对无知纯真的中学生设下的政治陷阱。这样的政治审查一旦成为制度，就成了对青年学生进行政治控制与迫害的杀手锏，扼杀了多少年轻有为的青年！

而且这样的政治审查材料还要进入个人档案。这就将政治控制与迫害延伸到受害者的一生，许多人就因为档案里有政治不良记录而被控制使用，成了终身政治贱民。本书中许多有关回忆，实在惨不忍睹。这都是血写的历史，是必须正视的。

但一切体制都是有效也有限的。因为人的精神是压不服，摧不垮的。

于是有了“五八年的高中生”这样的“名片”和共同命名。如其中一位成员所说，多年来，他们“相知于心，始终都在相互寻觅”。现在，他们以这本《五

¹ 《“建议不予录取”》，《五八劫》，513页。

² 《五八劫》，370页。

³ 以上所引《指示》与《联合通知》见《五八劫》374页，371—373页。

八劫》显示自己抹杀不了的存在。

他们当年受难，是因为自己的独立思考。而以后也从来没有屈服过。

1962年，他们给周总理写信，却被作为反革命事件追查，有的被提审五、六次之多，有的因此而入狱。¹

1967年至1968年，他们成立“五八高三造反联络站”，查阅并复制了大量有关五八社教的文件和当事人写的证言。在以后的“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中，又遭到残酷迫害。但他们仍冒着极大的风险，将这些材料保存下来，留下了历史的铁证。²

从2005年开始，经过三年的努力，他们又编辑、自行出版了《五八劫：一九五八年四川省中学生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记实》一书：“用五十年的血和泪，记下这行将被遗忘的历史”。

他们有理由这样无愧地回顾自己的一生——

“有一句话，我必须讲出来，就是四十八年来，我从来就没有向他们认过一次错，也没有向他们写过一份检查。我始终认为我是受害者，我对得起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起码良心”。³

“回顾几十年风风雨雨，我深切地感到我们这些入另册的同学，虽然未成年就遭受不公正的政治待遇，但都能坚忍不拔地直面人生。他们在困难面前毫不退缩，挺着腰杆做人；在名利面前，淡泊人生，洁身自爱；在工作面前，兢兢业业，能挑重担，挥洒自如。虽然没有丰功伟绩，却为社会默默地奉献了一生”。⁴

历史将记着这一切。📷

¹ 陈启为：《给周恩来总理写信的前前后后》，《五八劫》，142——146页。

² 王建军：《五八高三造反联络站记事》，《五八劫》，189——190页。如何看待文化大革命中的“造反”和对李井泉这样的当权者的批判，以及积极参与这样的造反和批判的“造反派”，这是一个至今尚未解决的问题。这需要具体分析，绝不能因为总体指导思想、路线上的错误，而不加分析地一律否定，更不能“反右思维与逻辑”，视之为“阶级报复”。像“五八高三造反联络站”的造反活动，或许有那个时代的某些问题，但其正当性与正义性是应该充分肯定的。至于造反派问题，我完全同意何方先生的看法：“把文革中的坏人坏事尽量往造反派的箩筐里装，把造反派妖魔化，这都早已成为普遍现象”，“被弄得面目全非的造反派，是一个需要重新研究，还它本来面目的问题”。（《从延安一路走来的反思——何方自述》，466页，473页，明报出版社，2007年出版）

³ 王建军：《我是死过一次的人——胡星林访问记》，《五八劫》，112页。

⁴ 张安杰：《小凉山怀旧》，《五八劫》，132——133页。

【述往】

1973—1977：我的“二外”记忆（1）

李红云

“工农兵学员”——一个已经远去的名字，在本文中指在1970-1976年进入高校学习的大学生，他们是中国高等教育特有的产物。在通常的语境中，作为政治符号的“工农兵学员”往往是一个带有文革烙印的“贬义词”。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全国高校停止招生。这意味着无数青少年的求学经历戛然而止，他们的命运由此改变。他们离开中学去了农村、工厂、部队，成为新一代的工人、农民和士兵。

1968年7月21日，毛泽东在《人民日报》上刊登的“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的调查报告中，在“编者按”里加了一段话：

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和农民中选拔学生，到学校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¹

这段话就是著名的“七二一指示”。此后，各高校开始举办各种试点班。

1970年6月27日，中共中央批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供各地参考。该报告中提到的招生条件是：

政治思想好、身体健康，具有三年以上实践经验、年龄在二十岁左右，有相当于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工人、贫下中农、解放军战士和青年干部。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工人、贫下中农，不受年龄和文化程度的限制。还要注意招收上山下乡和回乡的知识青年。²

¹ 《人民日报》，1968年7月21日。

² 转引自刘慧：“中国高等教育的怪胎——工农兵学员探析”，山东大学硕士论文，2010年4月，第26页。

这就意味着从1970年开始，不仅仅北大和清华可以招生，其他高校也可以招生了。从以后的情况来看，1970年和1971年这两年属于推荐入学的试点时期。招生办法为“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就是没有文化考试。

此后，从1970年的试点到1972年的全面招生，再到1976年最后一届推荐入学，全国高校按照这种特殊的“推荐制”招收的学生通称为“工农兵学员”，也称为“工农兵大学生”。七年中，全国共招收工农兵学员94万人，他们幸运地获得了当时令人羡慕的上大学的机会。恰巧我就是其中的一员。

我于1973年9月从工厂被推荐到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以下简称“二外”）英语系学习，至1977年2月毕业。那时正值“文化大革命”的末期，也是中国历史上跌宕起伏的几年。

值得注意的是，1973年入学的工农兵学员是七年中唯一一届经历了文化考查入学的学员。

1977年，随着高考制度的恢复，“推荐制”退出历史舞台。“工农兵学员”的光辉从此暗淡，他们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不仅如此，随着对文革的彻底否定和教育的发展，经过高考进入大学的毕业生不断走上社会，开始在各行各业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至此，作为政治符号的工农兵学员的历史也走到了尽头。“工农兵学员”的学历使他们陷入到尴尬的境地。

1980年，时任教育部长的蒋南翔宣布工农兵学员的学历为“大专”。1993年国家教育委员会和人事部联合下发文件，明确规定1970年到1976年选拔入学的高等院校毕业生，国家承认学历为“大学普通班”，简称“大普”。¹“大普”学历的确定并没有结束他们的尴尬，随着学位制度的施行，随着他们年龄的增加和生活压力的加大，反而使他们中很多人的处境更加艰难。

从轰轰烈烈到冷冷清清，从叱咤风云到平淡琐碎，从豪气干云到无可奈何，诸多形成强烈反差的形态，在后来的日子里，以未曾预想的方式出现在他们身上。

作为一名曾经的工农兵学员，我是这段特殊历史的亲历者和参与者。

对于很多人，尤其是一些年轻人来说，工农兵学员业已成为一个陌生的历史名词。我们当时生活的时代是与现在完全不同的时代，那是一个思想受到禁

¹ 转引自刘慧：“中国高等教育的怪胎——工农兵学员探析”，山东大学硕士论文，2010年4月，第11页。

辄，极左口号满天飞，封闭、偏激的时代；那是一个没有电脑、没有互联网、没有手机、没有微信的时代；那是一个物质匮乏，需要各种票证的时代。在那个时代，在那个“泛政治化教育”中，我们接受了怎样的教育？如何学习？如何生活？有过怎样的努力与追求？如何评价那段历史？应该汲取哪些教训？

如今，当年青春年少的我们，已经迈入人生的暮年。我想尝试着把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告诉后人。

算起来，这段历史并不遥远，但对于现在的年轻人，已有相当的隔膜和距离感。也许，这种距离感会掩盖“最有价值的材料、信息、线索和现场感，使得许多对当代人而言是常识的东西有可能永远变成后人难以索解的历史之谜。”¹

尽可能留下我们那个时代的真实客观的现场，供后人了解、研究、评价、思考，尤其是从历史的发展中汲取教训，以利于将来更好的发展。这是我写下这些文字的初衷。

既然是“现场”，就要依据客观的原始资料，尽可能真实地记录。幸运的是，我保存了当年的一些原始资料，包括：几乎所有的教材（含专业课和非专业课）、作业（有些是老师批改过的）、笔记、记录、照片、自己创办的刊物，等等。这些资料或许可以帮助读者获得一些“现场感”。

在没有文字记录的情况下，我根据自己的记忆，并找当年的同学进行了反复的核实，力争还原那个真实的“现场”。

一、1973年，我的“高考”

招生条件的变化

在1970年至1976年实行的高校招生的“推荐制”中，1973年是较为特殊的一年。之所以特殊，是因为1973年的招生虽然仍然沿用了“推荐制”，但加上了“文化考查”。

1970年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招生试点具体意见修改稿》提出选拔学生的条件主要有两个：首要条件是政治思想好；第二个条件是有实践经验，有三年

¹ 王学典：“最真实的历史有可能是当代史”，王兆成主编：《历史学家茶座》（第八辑），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卷首语。

以上的实践经验。在对文化程度的要求上，仅要求相当于初中以上，而且对有丰富经验的工人、贫下中农可以不受文化程度的限制。¹这样一来，对文化程度的要求已是形同虚设。

1971年，极少数高校开始按以上条件和办法试行招生。

1972年，全国高校开始全面招生。根据试点经验，基本采取了“推荐制”的办法。

“推荐制”不需要考试，只需要推荐入学，彻底否定了原来的高考制度和择优录取的原则。因此，高校的招生大大降低了高校入学新生的文化素质，造成了教学秩序的混乱和教育质量的严重下降。

1972年10月14日，周恩来会见李政道和夫人，就国内教育和科研方面存在的问题谈话。关于教育问题，周恩来说：学校学生应“以学习为主”，“对学校社会科学理论或自然科学理论有发展前途的青年，中学毕业后，不需要专门劳动两年，可以直接上大学，边学习、边劳动。”²这显然是对“推荐制”的一种调整。

1973年4月3日国务院批转国务院科教组《关于高等学校1973年招生工作的意见》中指出：

各地应遵照毛主席关于‘又红又专’的指示，在群众推荐、政审合格的基础上，重视文化程度，进行文化考查，了解推荐对象掌握基础知识的状况和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保证学生具有相当于初中毕业以上的实际文化程度。同时也要防止‘分数挂帅’。考查的内容与方法，各省、市、自治区可根据本地具体情况和各地专业的不同要求进行试验。³

这是自1970年高校招生实行“推荐制”以来，第一次提到了“重视文化程度”，而且提出了要进行“文化考查”。在措辞上使用“考查”，而非“考试”，

¹ 杨学为编：《高考文献》（上），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632-633页。

²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5月版，第558页。

³ “上海两个工厂是怎样进行文化考查的”，载杨学为编：《高考文献》（上），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664页。转引自董美英：“教育机会均等视阈下重点高校大学生来源的历史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9年，第88页。另可参见程晋宽著：《“教育革命”的历史考察：1966-1976》，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1年8月版，第430-431页。

显然是为了避讳。尽管如此，这是调整教育政策的一个重要文件，初步贯彻了周恩来的一系列指示精神，对推动全国教育界的纠左纠乱，起了巨大的作用。¹

为落实具体的招生办法，国务院科教组《关于高等学校1973年招生办法中若干问题的通知》中指出，“至于考查内容和方法，全国不作统一规定，由各省、市、自治区掌握。”²

据此，各地根据情况开始了文革以来唯一的一次高校招生的文化考查。

我恰恰赶上了这次文化考查，这也是我的“高考”。

1969年躲过了上山下乡的我，初中毕业被分配到铁道部南口机床车辆机械厂（以下简称“南口工厂”）当工人。怀揣着大学梦想的我，一直没有放松过学习。1970年大学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71年以后，有关大学的消息不断传到我所在的工厂。先是有北大的工农兵学员来到我们车间劳动，72年工厂又开始推荐青年工人上大学。尽管这次推荐上大学并没有公开进行，但已足以让我看到了上大学的希望。

于是，我在工厂开始边劳动，边利用业余时间进行文化学习。尤其是在1972年10月，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第一次开办了“业余英语广播讲座（英语初级班）”，家人给我买到了一本教材，父母给我买了一台当时市场上最好的半导体收音机——《牡丹 8402》。在父母和家人的鼓励下，中学学习俄语、26个英文字母还认不全的我，开始跟着广播学起了英语。

俗话说“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我终于成了那个有准备的人。

那是1973年。

群众推荐

当时的大学招生，并非向社会公布，也没有招生简章（至少我没有见过）。名额是按单位组织系统分配的。

值得一提的是，1973年国务院颁发了55号文件，允许音乐、体育、美术和外语有专长的知识青年加试，可以不受当地推荐名额的限制。该文件由周恩来

¹ 周全华：《“文化大革命”中的“教育革命”》，中共中央党校博士论文，1997年，第119页。

² “上海两个工厂是怎样进行文化考查的”，载杨学为编：《高考文献》（上），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664页。

签发。¹这表明，单一的“推荐制”正在悄悄地开始变化。

记得是在5月左右，厂里传达了国务院关于1973年从工农兵中选拔大学生的文件，随后公布了从青年工人中推荐上大学的名额和条件。除了政治条件外，还有“文化考查”。并公布了考查的具体时间和办法。

我所在的南口工厂隶属于铁道部，那年铁道部分配给南口工厂上大学的名额是6个。由于要和实践相结合，所以招生的学校基本是理工科的，有：北京工业大学、北京钢铁学院、哈尔滨工业大学、长沙铁道医学院，只有一所文科院校——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以下简称“二外”）英语系。几所学校的招生条件基本一样，只有二外要求年龄限制在22岁以下。

当时全厂的青年工人有上千人。如何分配这6个名额成了厂领导的难题，经过研究厂里决定采取如下作法：符合条件的青工自愿报名，由全厂18个单位（含车间、医院、学校），不论人多人少，各单位推荐一人，共18人进行文化考试，再从中确定6人。相当于被推荐的人中每3个人竞争一个名额。

我成了这个办法的受益者。因为我所在的车间青工人数较少，文化考试又吓退了好几个人，竞争并不激烈，我幸运地被推荐。

推荐之后接下来的事就是填报志愿。厂里规定每人可以填报两个。

对我而言，招生专业基本跟我的工种（建筑车间油漆工）没什么关系，我只能报二外或医学院。征求了尚在“五七干校”劳动的父母的意见后，我决定只报二外一个志愿。父母的考虑是，学医会存在分配到农村的可能，因为当时的口号是“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要放到农村去”。而学外语不会离开大城市。

至于我为什么要上大学，简单说就是对知识的渴望，相信“知识改变命运”，不甘心在工厂干一辈子。

备考

考试的时间大概是在六月份。报名之后有一段备考的时间。

根据厂里的通知，考试分为笔试和口试两种方式。笔试的科目为语文和数学；物理和化学是口试。命题的是工厂的技术人员，其中大多数人是原南口铁路技

¹ 涂胜华：“自强不息 饮水思源”，载于《二外四十年》编辑委员会编：《二外四十年》，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年10月版，第541页。

术学校（中专）的老师。虽然估计考试不会太难（因为只要求初中程度），但我实际只在初中学习过两年，严格说初中并没有毕业，几何和化学我根本没有学过，而且初中学过的功课早已忘得差不多了，所以这次考试对我来说还是有难度的。

对大学的渴望似乎压倒了对考试的畏惧。我迅速找来了初中的全套课本，开始了紧张的自学。一复习我发现差距并不大，这主要归于我毕业的中学——北京师大女附中¹，这是北京著名的重点中学。我在初二的时候已经学习了高中的数学，看看书就都想起来了。但几何我根本没学过，不过没关系，我完全可以自学。记得有一个星期天，我用一天的时间啃下了一本应该一个学期学完的几何课本。至于物理，我在中学时是班上的物理课代表，看看书好像也能应付。化学有点困难，只好死记硬背。好在背功还可以。

就这样，经过一段时间的复习，我信心十足地迎来了我的“高考”。

考试

我们18个人的考场设在了南口原铁路技术学校主楼的一间教室里。离我住的宿舍很近。没有发准考证，负责监考的是原技校的老师。

上午考的是数学，包括几何，题目不很难，几乎没有碰到什么困难我就完成了。自己感觉考得不错。

下午考语文。也许是上午太顺利的缘故，午饭后我竟在宿舍睡过了。当我急急忙忙赶到考场的时候，考试已经开始好几分钟了。我打开卷子一看，考题是写一篇记叙文，具体题目自己拟定。我飞快地调整情绪，整理思路，决定写自己刚经历不久的一件事，题目叫“暴雨之夜所发生的……”。写的是几天前下大雨，我们车间的水泥仓库进水，青年工人们半夜被紧急召唤冒雨抢修水泥仓库的事。

作文写的过程中遇到了点小的麻烦。因为久不考试，时间掌握不好，时间过了一半我发现还有好多内容没有写，时间可能不够。于是我还举手问能否延长时间，但得到的是否定的回答。于是我加快速度，终于在规定时间内写完了。

¹ “师大女附中”全称为“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今“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该校是一所历史悠久、在全国享有盛名的重点中学。

从头到尾检查一遍后我满意地交了卷。

第二天口试的科目是物理和化学。方式是自己抽两、三题，抽到什么答什么。

这两科是我的弱项，记得口试那天下着雨，考试的地方光线不太好，我的大脑也是昏昏沉沉的。物理我还知道点，化学不怎么会，是在主考老师的提醒下才答出来的。好在我报考的是外语学院，物理化学成绩只作为参考。考不好也无大碍。

接下来的英语口语对我来说可就关系重大了。

我跟着广播学习英语已有8个月的时间，竟然一次课都没缺地坚持了下来。到我参加“高考”时，已经能进行一些简单的英语会话，记住了一些词组和单词。

英语口语进行的异常顺利。主考的是二外的两位老师，后来才知道，一位是英语系的郭吉强老师，还有一位女老师是教俄语的涂老师。涂老师见到我后，很随意地问了一句，“你是女附中的？”这句话让我心里稍稍定了下来，因为女附中是北京著名的重点中学，老师显然注意到了这一点。

老师们和蔼可亲的样子让我的紧张情绪一扫而光。听说我跟着广播学英语，他们就让我读了一段广播教材中的内容，然后跟着他们读了几个单词。接着他们又拿了一篇《人民日报》中的文章让我读，读过之后把报纸一收，让我复述文章的内容。最后，那位教俄语的老师还让我说几句俄语。虽然俄语都忘得差不多了，但我还能背诵我学过的一篇课文“苹果树”。

随后，两位老师还向我了解了一些家里的情况，还问我有什么文体方面的特长。我如实回答我会打排球，初中起就在青少年业余体校训练。

从二位老师的眼中我看到了满意的神情。口试就这样结束了。

录 取

考试之后不久，虽然成绩没有公布，但我得到的消息是考得都很好，很有希望。正当我满心欢喜地等待录取的时候，一个事件的发生差点让我上大学的理想化为泡影。这就是“张铁生事件”。

张铁生作为辽宁的一名考生，考试时由于答不出物理和化学的试题，在试卷背后写了一封给领导的信。这封信以“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为题在《辽宁日

报》上刊登¹，并在“编者按”中上纲上线，直至否定这次文化考查，认为是“复辟”“反攻倒算”。后来这篇文章又被《人民日报》转载，并在另加的“编者按”中说：“这封信提出了教育战线上两条路线、两种思想斗争的一个重要问题，确实发人深省。”²随后，该文被全国各地报刊纷纷转载。一时间，张铁生成了敢于交“白卷”的反潮流英雄。

这一事件几乎直接宣布了此次招生中文化考查的无效。因此，有人将1973年高校招生的“文化考查”称为“流产的高考”。³

还记得从广播和报纸中得知这件事时那种被冷水浇头的感觉。想想自己为这次考试的辛苦付出很可能会付之东流，情绪低落到了极点。那一段时间是我最难熬的一段日子，好几次我跑到厂里找到负责这事的干部，打听录取的消息，诉说自己上大学的愿望。

好在焦急的等待之后，终于等来了好消息。8月底我拿到了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录取通知书，欣喜若狂。在离开工厂之前，厂长在办公楼会议室专门给我们6个上大学的青工开了个欢送会，说了许多语重心长的话。

后来我才知道，“张铁生事件”对我并未造成影响。我的考试成绩，尤其是英语口语中的优异表现成为录取我的决定因素。稍微有点小麻烦是在性别上，因为二外原计划招收的是男生，但二外的两位老师坚持录取我。他们强调，“这个学生如果不收就太可惜了。”在他们的坚持下，并征求了上级单位的意见后，我才得以录取。

几天之后，我离开了南口工厂。从此和工人身份告别。

1973年9月14日是我人生中有重要意义的一天。这一天，我到二外报到，成为一名“工农兵学员”。

从这天起，我的身份发生了转变——从工人转变为知识分子。

让我没有想到的是，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离开过学校。从此开始了我读书、教书、写书的生涯。

正是在1973年，提高教育标准的运动加快了步伐。这一年全国高校招生人数为149,960人，几乎所有大学都进行了文化考查以保证新学员具备初中以上文


¹ “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辽宁日报》1973年7月19日。

² “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人民日报》1973年8月20日。

³ 参见屠筱武：文革期间的流产高考，《江淮文史》，2016年第3期。

化。¹但这一新动向被激进分子视为企图复辟资本主义，是由学术界及其政治靠山推动的复辟旧的教育秩序的“逆流”。²后来，1973年的文化考查还被指责为“沿袭旧高考的办法”，以后文化考查只能用调查访问、座谈讨论的方式进行。

此后，直到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工农兵学员的招生再也没有进行过“文化考查”。这样，1973年入学的工农兵学员也就成了工农兵学员中唯一一届经历了文化考查的学员。

我所经历的这次文化考查，也有幸成了我的“高考”。

【述往】

画说我这一生

刘海鸥

一、梦一般的记忆碎片（1947-1951）



写完自传，闲余就想着把自传变成画面。稍微练了练笔就动手了，从零岁开始，画着画着，七十多年的生活像电影一样，一幕一幕地浮现在眼前。三年时间画了六百多张，画到了文革结束。这将是一个长长的系列，如果你们有兴趣，

就慢慢地看下去吧。我没有学过美术，就是一个画画爱好者。我的画面并不完美，但是我觉得好玩之处就在于不完美。

1947年1月我在大连出生。我的记忆开始得很晚，不像我姐姐海燕，她能

¹ 李江源著：《我是一个工农兵学员——泛政治化教育中的受教育者》（上），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12月版，第329页。

² [美]R. 麦克法考尔 费正清/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下卷 中国革命内部的革命 1966-1982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8月版，第577页。

把两岁的事情说得清清楚楚。而我的女儿又佳就更吓了我一跳，她言之凿凿地说，她生下来的第二天，看见我和她的三姨（我妹妹克阳）去婴儿室探望她，三姨俯身看着她，一张大脸，而且她还描述了婴儿室的样子——灯光很暗。我向克阳求证这些事，她说又佳说的事情一点不差。而在这之前从来没有人对又佳提到过这些事。

回来说我的记忆。两岁以前，我们一家人都在大连。关于大连我没有任何印象，只是后来不断地听妈妈讲起我两岁前的一些事，比如我是出生在一家日本人开的医院里，正值过年，医院里没有什么医护人员，连暖气都没有，我一生下来就感冒了，打喷嚏流鼻涕，身上冻得发紫，小命差点没保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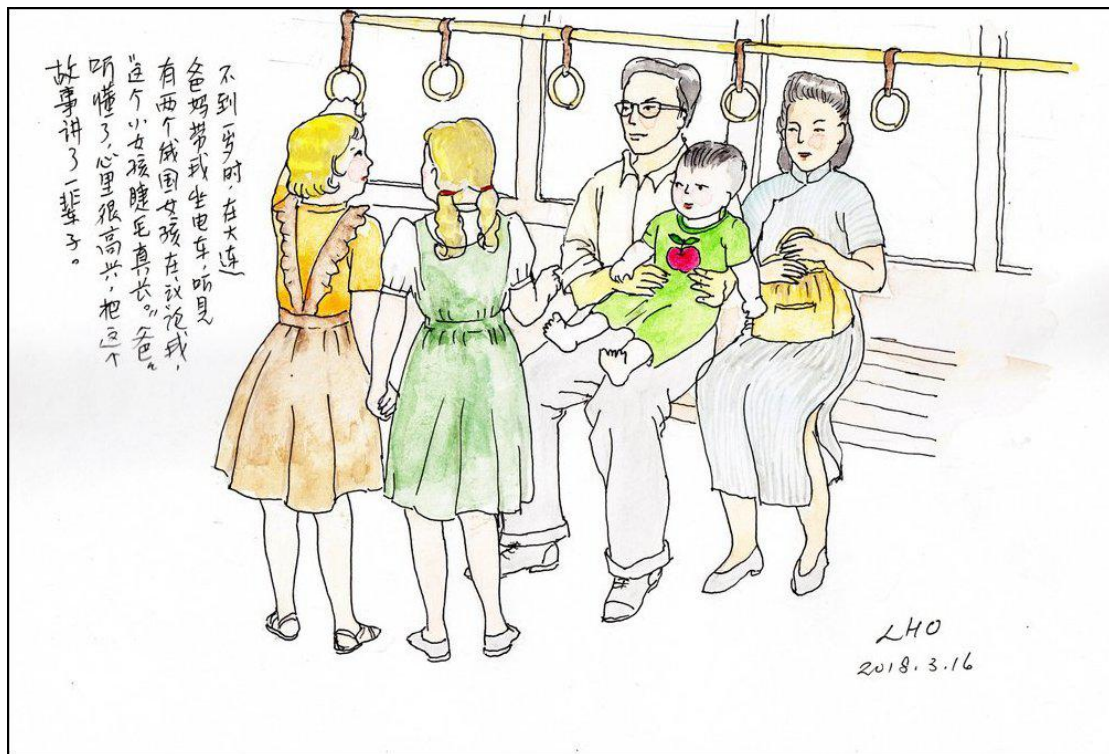
怎么一出生就和日本联系在一起呢，这曾经让我在孩提时代觉得耻辱。回想起来，为什么那么小就知道恨日本了，其实也很自然，抗战结束没几年，整个中国还处在痛恨日本人的强烈气氛中。

爸爸为我取名刘海鸥，我还有一个姐姐刘海燕。爸爸是俄文翻译，思想进步，说海燕意为勇敢，海鸥意为自由。后来我们的性格真应了这两个名字。



还记得一岁多时被开水烫坏了屁股。屋子里有一个铜盆，放着刚烧开水，我在屋里跑来跑去，一下子坐在铜盆里，穿的是开裆裤，屁股给烫烂了，哭得接不上气。父母立刻把我抱到医生那里，又是日本医生。妈妈说医生给了一种日本药膏，特灵，一抹就止住了疼痛。妈妈说，晚上我不再哭泣，只有几声哀吟。后来我有病时妈妈总是很担心，她说我有极强的忍耐力，病痛的实际程度要比表现出来的严重得多。

我以为忍耐是一种优秀品质。直至中年以后，才发现就是这种忍耐力掩盖了我的身体实情，使我的健康状况千疮百孔，而从精神层面上来说，忍耐有时候会摧毁意志和自信。



每个家长都会记得孩子小时候的几件事。爸爸口讷，不爱说话，但是讲得最多的是我的长眼毛的故事。有一次他抱着我坐电车，上来了两个俄罗斯姑娘，看见我她俩就用俄语议论：“看那个小女孩，睫毛多长。”爸爸听得懂俄语，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这件小事他不知给我讲了多少次，直到我五十多岁，他还在津津乐道。爸爸妈妈一直为我有长长的睫毛而骄傲，照相时总要让我侧过脸去照出睫毛，还特地带我到紫房子照相馆照了一张侧面的相片，为睫毛留个纪念。



姐姐海燕，比我大两岁。我们常常为了小事吵架，打架。这是照一张照片画的，海燕在哭闹。据她后来回忆，是因为苹果大小分配不均。

一年后我又有了一个妹妹克阳，以攻克沈阳取名。



爸爸在大连的光华书店当编辑。1949年6月，光华书店老板邵公文到北京三联书店工作，把爸爸也带了过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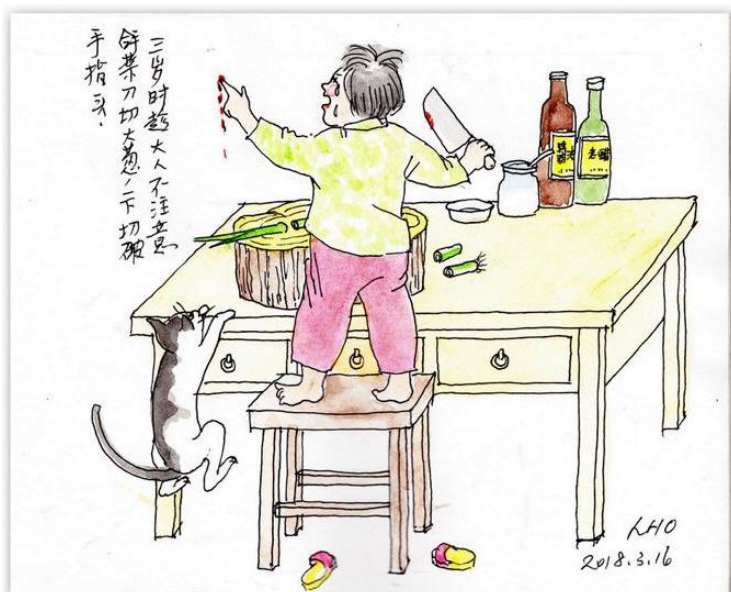
爸爸到北京不久得了伤寒症，妈妈就在当年的9月带着我们三个孩子从大连到北京照顾爸爸。

十月一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大典，妈妈带着我们上街看游行。就是说，我也见证了那个“历史时刻”，我不仅一定看到了欢天喜地的人群，而且一定从街上的大喇叭听见了那句伟人用湖南方言传播的历史声音，但是我什么印象也没有，之所以写了这一段，因为我经历了而且这确实算一个历史阶段的开始。

妈妈那天大有斩获，在这个陌生的城市，忽然有人高喊她的名字，回头一看是邵公文的妻子黄慧珠，她正在筹建全国妇联。马上妈妈也有了工作——全国妇联儿童福利部。妈妈在妇联一待就是一辈子。

爸爸先在三联书店当编辑，后来调到国际书店任副总经理。爸爸不喜欢做行政工作，只想回自己的本行搞翻译，1951年3月人民文学出版社一成立，他就成了出版社的第一批成员直至退休。

我们全家就算在北京落了脚。



这时我已经开始有了记忆，第一个记忆是切破手指。大人切菜，菜刀追着手指，刀过菜碎，我饶有兴趣地在一旁观看。大人叮嘱过千万不可碰触菜刀，可切菜不是就那么简单吗？尽管三四岁，我已经知道大人经常危言耸听，吓唬小孩，所以我并不把大人说的话都当回事。一次趁大人不在，我拿起菜刀，案板上有一根葱，我挥舞着又沉又笨的大刀，把大葱剁成一段段，心里洋溢着成就感，原来使用菜刀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随着大葱的粉身碎骨，我更加怀疑大人说话的正确性，我做出了结论：大人会用谎言哄骗孩子，以求安宁。就在为这个结论得意时，最后一刀落在左手食指上，削掉了指甲和一块肉。伤疤至今还清晰地留在手指上。尽管大人及时地进行了听话教育，但是效果不大，伤疤好了疼也忘了，在后来的一辈子，我仍然要自己去尝试一切。



还有一个记忆是妈妈在床上痛苦地翻滚。后来才知道那是妈妈怀四妹刘元的初期得了胆结石，痛起来翻天覆地。我清楚地记得妈妈在床上打滚，姐姐海燕站在床边哭着念叨：

“妈妈你不要死呀，妈妈你不要死呀。”我则站在床边，眼睛盯住妈妈枕边的两个从里面画着画的小瓶子（一个是古代山水图，一个是古装小孩嬉戏图），机械

地叨念：“我要小瓶，我要小瓶。”海燕哭骂道：“没良心，妈妈都快死了，你还要玩小瓶。”后来很久海燕骂我时还是以此事作为我没良心的佐证，一到这时我就哑口无言了。多年后，我才分析出来，我的心思根本不在小瓶，我整个身心都被死的恐惧控制了。我不知道什么叫死，从姐姐的哭叫中，我隐约知道，那痛苦的翻滚和死很近。

那大约是1950年四五月的事情。后来妈妈做了切除胆囊的手术，胆中的结石就放在那个彩色的小瓶中。



最初的记忆如打碎的玻璃，零零星星，却都和房子有关。不知道为什么我从小就对各种各样的房子有深刻的兴趣和印象，后来的几十年，我梦见最多的就是房子，有一些在现实中从未见过的房间不断重复出现在梦中，甚至上百次，我总觉得它们一定和我失落的记忆有关，它们可能是大连的住房，或者是与我前世的某一生的住所有关。

最初在北京的住所是东总布胡同22号出版总署的宿舍，一个二层楼上。有大玻璃窗明晃晃。家里空荡荡的，床上好像什么都没有，只是睡在木板上。我想这是不可能的，可五十多年后和妈妈提起此事，妈妈却说，就是什么都没有。

关于房子的第二个记忆是东四南大街的演乐胡同73号，爸爸把安徽乡下的

奶奶接到北京，就住在那里。1951年妈妈生刘元，在王府大街的大鹁鸽市胡同找了一间房子单住。从托儿所（那时不叫幼儿园）回来爸爸就直接把我带到演乐胡同，我和奶奶没有一点感情，她不喜欢我，因为我是女孩，奶奶也不喜欢妈妈，因为她是“南蛮子”（奶奶因为妈妈每天要洗屁股而鄙称她为“南蛮子”），更糟糕的是她生了四个女孩，没给刘家留下一个男孩。我在托儿所憋了一个星期，最想见到的是妈妈，却要面对冷冰冰的奶奶，心里十分凄凉。演乐胡同的家给我留下的印象是昏黄的灯光和失去亲人依靠的恐惧。奶奶不习惯北京，不久就回乡下去了。



星期天爸爸会带我去大鹁鸽市看妈妈和小妹妹。胡同里有一条大黄狗，和我一样高。那阵北京还没有打狗一说，大大小小的狗在街上神气活现地行走。我绕不过去了，只能背靠墙根一点点往前蹭，狗盯着我，我看着它，嘴里念念有词：“死样活气，死样活气，死样活气……”这是妈妈的口头语之一，此时如护身咒语。就这样，我俩对峙着，直到黄狗失去兴趣，转身离开。

直到现在我还是相信咒语，我会念很多佛家经咒，尽管我并不崇拜任何宗教，也不追究经咒的内容和意义，它们给我的是平和与安全感，正如四岁的我并不明白“死样活气”的意义，但是对我有效，同时我也相信，只要直面险境，人总是有办法脱身的。



妈妈的屋子明亮而温暖，尿裤子挂得到处都是，有一股暖烘烘的奶臊味，我在屋里跳来跳去，虽有大人呵斥，心里踏实而愉快。最美的是有的星期天晚上我们可以留在妈妈这里睡觉。结果就有那么一个夜晚，我们正在

大鹁鸽市酣睡，隔壁的木材加工厂突然起火。全家人从梦中惊醒，我清楚地记得窗户外面红通通一片，可以望见熊熊火光。爸爸妈妈拉扯着我们跑到附近的博氏幼稚园躲避。博氏幼稚园是有名的私立幼稚园，院长全老师是一个可亲可敬的妇人。那一夜我们一家受到了周全的照顾，吃点心喝茶说话，临走时除了父母的感谢，心直口快的海燕道出了我的心声：“等下次再着火，我们还上你这儿来。”

爸爸妈妈非常喜欢带我们逛公园。一次在颐和园万寿山的后山，下了佛香阁有一条下山路，我撒开丫子跑了起来，收不住脚了，越跑越快，一下子来了个狗啃泥趴在地上起不来，身边一个解放军叔叔连



忙把我扶起来，我恼羞成怒，哭着举起拳头打他，还喊着：“打你，打你！”妈妈赶紧过来解围道歉。



一次爸爸陪同一些苏联专家游颐和园，我们一家人也都去了。中午在听鹂馆吃饭，吃的是西餐，第一道是面包，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吃，拿着西餐刀专心致志地把面包切成一个个小丁，苏联人看着好玩照了一张相，留下了我傻呵呵的样子。

二、排排坐，吃果果（1951-1953）

三岁时妈妈送我上了中山公园托儿所，这是一个设备及师资均为一流的市立幼儿园，但是我从来没有喜欢过它，因为从进去的第一天起，我首先懂得了，生活不总是自由自在的，有一种权威你必须服从，你必须和大家坐在一起排排坐吃果果，否则就会遭到惩罚。



从大连到北京不久，我和海燕就进了中山公园托儿所——1949年后由全国妇联操办的第一个公立住宿托儿所，当时叫市立第二托儿所，现在叫市立第三幼儿园。托儿所的师资和设施大约还是不错的，当时能进去的多是社会名流和高官子女。我之所以能上这个托儿所，纯粹是因为妈妈在妇联的儿童福利部工作，近水楼台先得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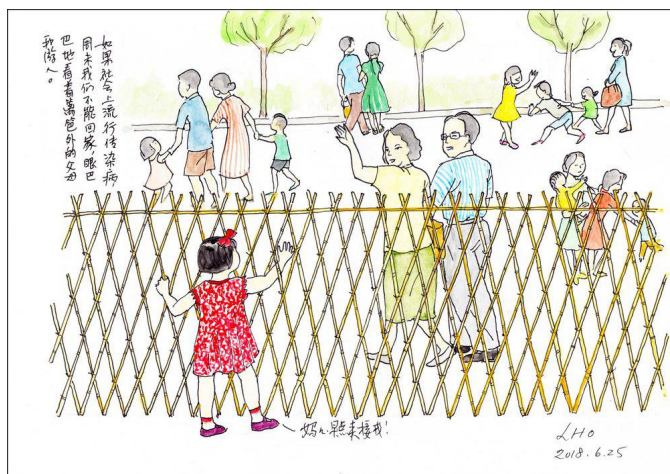
托儿所在中山公园里面，社稷坛的一角，东边是五色土，南边是一片百年古松覆盖的林荫道，道边一片芍药花。托儿所的墙外有一个小小的动物园，里面有孔雀、八哥，还有猴子。阿姨经常带我们去看孔雀开屏，孔雀见到人多，不慌不忙地转两圈，张开尾羽，引来人们一阵欢呼。我第一次看到八哥时，喊道：“鹦鹉，鹦鹉！”那鸟儿竟开口说话：“我是八哥。”在这之前我对鸟儿会说话是怀疑的，八哥的辩解让我大大惊奇了一番。

尽管我上的托儿所全市数一数二，小朋友的活动很丰富，玩游戏，做手工，唱歌跳舞，大多数小朋友十分享受托儿所的生活，但是我一直像一个局外人，从始至终未与托儿所融为一体。



每星期一上托儿所前我必以无尽无休的哭闹反抗。爸爸有记载，在1952年5月12日星期一的日记里写道：“海鸥闹别扭，不愿意穿皮鞋，我按住她的手脚，给她穿上后，抱她下地，她不站着，

直打嘟噜。坐到地上又把鞋踢掉。气得我把她扔到沙发上。她神气倔强，嘴里还骂人‘死王八蛋’。”爸爸不知道，我对上托儿所有多么的恐惧和抵触，尽管这时在托儿所已经呆了一年多了。



我的全部心思就是一日复一日地盼望着星期六的到来。对我来说最大的灾难是街上流行传染病如猩红热、麻疹、流感时，托儿所立刻与社会隔绝，周末小朋友不准回家，只允许家长前来探望。

我盼星星盼月亮地等待着父母，他们来了以后，一定会在我的小衣兜里装满吃的，甚至会带着我在公园里逛逛，去看看“塘花坞”，那里有我永远也看不够，遐想不尽的喷水假山；要不就是到“水榭”坐一坐，那本来是一个坐看垂柳倒影的清幽之地，有了我们小孩子，就吵翻了天；或者去看金鱼，进中山公园正门往左手走，有几十大木盆金鱼供参观，什么奇妙品种都有；必定要去的地方是“来今雨轩”，在那里吃一顿午饭后，我当天的幸福生活就结束了。饭后他们把一万个不情愿的我送回托儿所，就离去了。有时海燕的六一幼儿园、克阳刘元的妇联托儿所也同时隔离，爸爸妈妈一天要探三个班，来去匆匆，我捂着他们给我装满零食的小兜，心中无比凄凉地目送着他们离开。



我不喜欢托儿所是因为我们整天都在牢牢的管束之下。比如说给你吃什么你就必须吃什么，没有愿意不愿意的选择。我最恨吃牛奶，特别是热奶上的那层皮，但是在托儿所每天早上都要喝牛奶，而且牛奶上面还要滴一管鱼肝油——另一

一种我更恨的东西——腥味十足。我勉强沿着碗边把牛奶一口气喝尽，留下奶皮粘在碗底。阿姨要是发现一定会逼着我把奶皮吃掉，我只好抓起已经冰凉的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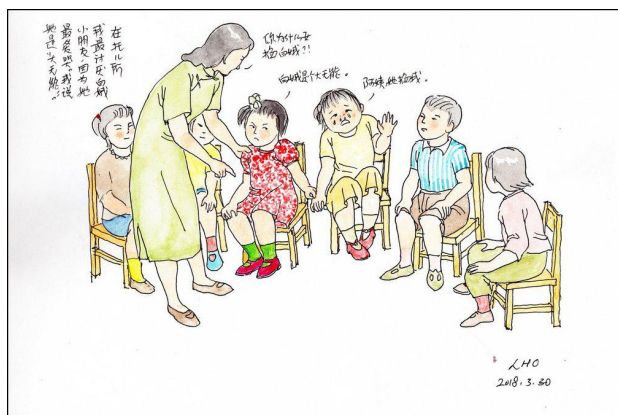
乎乎滑腻腻的奶皮，像吃药一样吞下，一天都感觉着它的凉、滑、腥，总想呕吐。后来我想了一个主意：通常喝完奶的小朋友依次把碗交到阿姨跟前，落成一摞，我就等有人正要交碗时抢在他的前面放上我的有奶皮的碗，紧接着他的碗就落在我的上面，如果阿姨没有注意，就算混过这一关，可是阿姨往往会发现，我还得抓起那被别人碗底粘过的奶皮吃掉，更恶心。

还有洋白菜，我觉得它有一股令人作呕的奶味。每次吃洋白菜我都只扒白饭，把菜剩下。阿姨下决心治治我的毛病，晚饭后单独把我留在饭厅，守着一盘我没动的洋白菜，逼着我吃下去。她好话歹话不知讲了多少，我就是死不开口，两个人就在饭厅这么耗着，小朋友们已经睡觉，我终于屈服了，夹起一点菜放进嘴里，刚嚼了两下，便觉得翻肠倒胃地恶心，眼泪也冒上来。阿姨看我要吐，更难收拾，知道再逼也没有用了，只好放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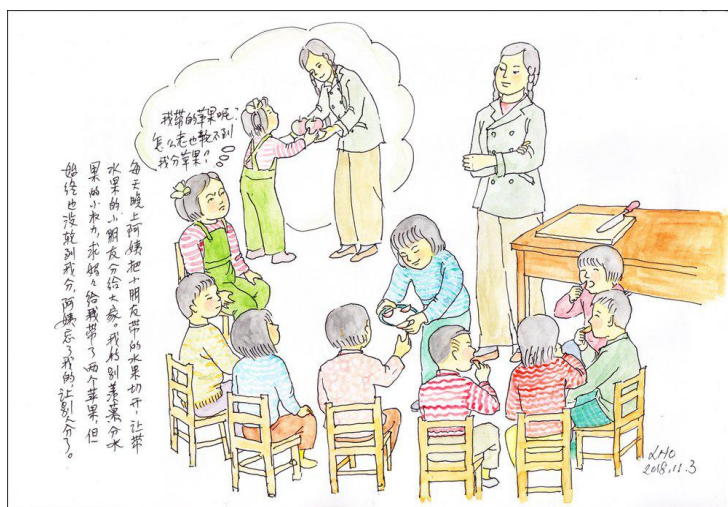
大便是统一的时间，每天吃完早饭，全体小朋友一人一个尿盆坐在活动室里拉屎。我早上往往没有尿，可是不把尿拉出来是不允许自由活动的。我只好想招子对付阿姨，一有小朋友拉完屎离去，我立即就坐到他的尿盆上，

作出努力拉屎的样子。虽然人家暖烘烘臭烘烘的屎熏着屁股非常恶心，但可以换来一个自由。当然这些小把戏常常瞒不过阿姨，于是不把尿盆坐穿是没有结果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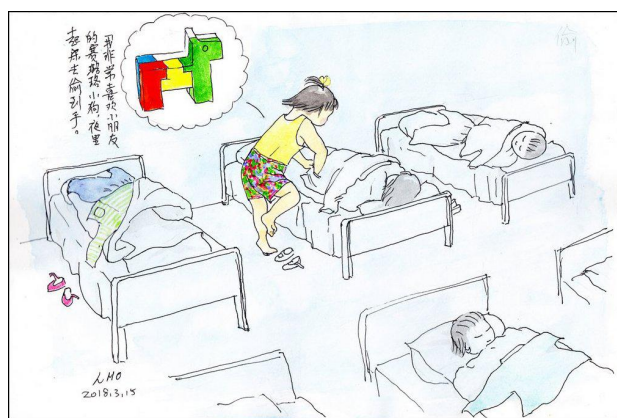
我不喜欢窝囊孩子。有一个小朋友叫白娥。她尿床流鼻涕哭死宝，呆头笨脑，什么也不懂也不会。我最瞧不起她，如果她挨我坐着或站着，我就会嫌恶地掐她的手，她就会咧开大嘴，鼻涕过河地大哭。阿姨常向爸爸妈妈告状。爸爸问我：“你为什么掐白娥？”我说：“白娥是个大无能。”结果爸爸妈

妈忍俊不住，把此话记在“海鸥语录”中。人那么小就知道欺负弱者，难道恃强凌弱必是动物以至人类的天性，是进化过程中强者生存的规律决定的？



每到星期一，有的小朋友会带回一些水果，晚饭后阿姨把水果分为若干份，让带此水果的小朋友分给大家。分水果的小朋友当然是把水果分给自己的好朋友，或阿姨眼中的好孩子。我不是好孩子，常常分不到一小块。我不知毛病出在哪里，特别羡慕分水果小朋友的小小权利，央求妈妈也给我带水果去。终于有一次妈妈给我带了两个苹果，我等待着分水果这个骄傲的时刻。好不容易盼到了晚上，阿姨把苹果切成小块，却让别的小朋友去分。几天后小朋友带来的水果都分完了，始终也没有轮到我。我问阿姨：“我的苹果呢？”阿姨说：“真的吗？你也带苹果了吗？”我不是那几个总带水果的孩子，阿姨根本就不记得我也带了水果去。阿姨说：“没关系，谁分都一样，都是大家吃了。”她不知道其中的差别有多大，我的眼泪流出来了，妈妈的苹果，像妈妈的心一样给我安慰，结果全被别人吃了。

在我记忆中的一件大事是“偷”小狗。有一次一个小朋友带来了一个赛璐珞小狗，一寸大小，由红黄蓝白绿黑几种颜色的不同形状的小块组成，可以拆开，拆开后需要动一番小脑筋才能装上。赛璐珞小狗吸引了一群小朋友，小狗的主人高兴了会让她喜欢的小朋友组装一回。我天生好奇，跃跃欲试，却连摸一下都没有份，于是我决定把它据为己有。



在我记忆中的一件大事是“偷”小狗。有一次一个小朋友带来了一个赛璐珞小狗，一寸大小，由红黄蓝白绿黑几种颜色的不同形状的小块组成，可以拆开，拆开后需要动一番小脑筋才能装上。赛璐珞小狗吸引了一群小朋友，

小狗的主人高兴了会让她喜欢的小朋友组装一回。我天生好奇，跃跃欲试，却连摸一下都没有份，于是我决定把它据为己有。

夜晚趁小朋友都睡着了，我起身到小狗主人床前，从她的衣服兜里找到了小狗，在被窝里拆开，黑暗中组装不起来，便一把攥在手里心满意足地睡去。



第二天一早，小狗的主人哭闹小狗没了。不知道为什么阿姨一下子就选中了我为嫌疑犯。现在回想起来，“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是千真万确的，而一个小孩子想在大人面前掩饰自己的企图更是徒劳的。阿姨把我叫到活动室的一个角落，站在一个落地大镜子前审我，我一口咬定没有拿。从镜子里我可以看到一个顽劣的小女孩充满敌意，又面露怯色地对大人撒着谎。阿姨说要搜兜，小狗的碎块就在我的裤兜里装着，我手揣在兜里紧紧抓住小狗块，扭着身子抗拒搜身。

正在这时有人通知阿姨去接电话，我知道这是唯一的机会摆脱麻烦的时候了，忍痛掏出小狗碎块扔在了一个角落。阿姨回来后，我立即摊开两手：“你搜吧。”阿姨很奇怪我为什么突然转变，她肯定知道我做了什么手脚，看看地上，看看四周，什么也没说，放我走了。

小狗事件风平浪静，凭良心说，阿姨这件事处理得好，没有扣以“偷”的帽子大作文章，让我下了一个台阶。而我深深体会到了据他人东西为已有的耻辱感，从此绝不再犯。

我始终没能够拥有一个赛璐珞小狗，也没能拆装别人的小狗，这愿望一直深埋在我的心里，三十多年后，我看见市场上有卖同样的赛璐珞小狗，买来一



个，拴在我的钥匙链上，但是已经失去了拆装的兴趣。



就这样一个孩子，阿姨怎么能够喜欢呢，罚站成了我的家常便饭。通常是站在活动室的一角，然后阿姨就不管了，直到下一个活动开始时才解除惩罚。有时阿姨根本忘记了，什么时候偶然经过，看见我还站在那里才想起来。有一次我

站得实在不耐烦，也没有人来过问，就大着胆子离开，阿姨看见竟熟视无睹。久而久之我被罚站时等阿姨一离开，我就又加入游玩的人群。我上小班时，海燕上中班（她大班时转到“六一”幼儿园），在托儿所里有一个亲人心里既踏实又安慰，虽然我们在家经常打架，但在托儿所里总是互相保护不受欺负。一天我正在院里院外玩得欢，突然发现海燕伫立在一个角落罚站，我跑过去拉她说：“走吧，没关系的。阿姨不会再管你了。”她不敢，规规矩矩地站着，一动不动，我只好在一旁陪着她。



托儿所的事情虽然都是些琐细的小事，但是对我的小心灵来说，都是大事，是伤害。

对托儿所的恐惧连中山公园都受到牵连，对我来说中山公园成了托儿所的代名词。

周末爸爸妈妈经常带我们出去玩，我最怕的是上中山公园，生怕他们顺便就把我送回托儿所了，经过爸妈千百次承诺不会送回托儿所，我才勉强跟去，一路上还要叨念着“我不上托儿所”。甚至上小学后，中山公园还是我的一块心病，

听到这四个字就心有余悸。

五十年代初，新华社给我们全家照了一张观鱼相片登在中外画报上，题曰“中国的双职工在周末带着孩子到公园享受全家乐”；照片中我的脸上一片凄风苦雨，一直在想，是不是要回托儿所了。



其实托儿所的生活是很丰富的，唱歌跳舞做游戏做手工，阿姨也很好，所长易光焕还是儿童心理学专家呢。这张照片是六一节表演唱歌，二排左二是我。



“新中国”建立之初，呼声最高的是“和平”，那时中国有两张最著名的宣传画，一张是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抱着和平鸽，笑得很甜，下面是稚拙的儿童书法“我们爱和平”；另一张是一个小女孩双手绞在一起，在墙上照

出一个和平鸽的影子。连花布也紧跟形势，我们穿的衣服上面也布满了和平鸽。我的一件衬衣是绿底白鸽的，海燕的衣服和我的图案一样，是蓝底白鸽。大人唱着“王大妈要和平，要呀嘛要和平，她每天动员妇女们来呀嘛来签名……”小孩唱“小鸽子真美丽，红嘴巴儿白肚皮，飞到东来飞到西，快快飞到北京去……”



和平的呼声虽然响彻云霄，但地面上从来没有一时安宁。战争和政治运动如扑岸之浪潮，一个接着一个。托儿所这块小小的土地，也随着大浪颠簸。我们幼小的心灵已经开始和国家的命运相连。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当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应北朝鲜请求入朝参战，中国也处于紧张的战备状态。为了防止空袭，所有的玻璃窗都要贴上米字条，这也成了托儿所手工课的一个内容，阿姨教我们怎样把报纸裁成长条，抹上浆糊，然后依次递给站在窗台上的阿姨。



经常有飞机飞过，撒下一大片传单，红红绿绿的满地都是。我们在公园里跑来跑去抢着捡起来交给阿姨，让她给我们念上面的内容，都是“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一类的宣传。

我们那时唱的歌曲是：“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还有一支歌是：“嘿啦啦啦啦，嘿啦啦啦啦，天空出彩霞呀地上开红花呀，中朝人民力量大，打垮了美国兵呀……”歌

的最后一句是“把帝国主义连根拔呀么连根拔”，我不明白是什么意思，以为是“铃狗巴呀铃狗巴”。小朋友们最喜欢的就是这句，每天早上全体坐在便盆上，铿锵有力的“铃狗巴”简直要掀翻屋顶。

仇恨美帝的宣传深入人心，每个小孩都会唱歌谣：“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老虎不吃人，专吃杜鲁门。”杜鲁门、艾森豪威尔之流在我们眼里简直就是恶魔的化身。



政府若有什么外事活动，常常从我们托儿所挑选孩子献花。我是一个健康漂亮活泼的孩子，献花总是有我一份。第一次是给世界和平主义者戈登夫人献花。托儿所特地为我们

们做了红色灯芯绒的短裙，圆领胸前打褶，长度刚过屁股。胸前缝了一排飞翔的和平鸽，白色，以银色的小珠片镶边。我生平第一次穿这么漂亮这么奢华的衣服，兴奋极了，以至当我们排队离开中山公园时见到游人在看我们，我得意得双腿跪地噌噌地用膝盖行走，被阿姨一把拽起，警告要把我遣回托儿所，我这才自律起来。



1952年，新华社和全国妇联的两位记者到中山公园托儿所挑选几个健康可爱的小朋友去照一张新中国儿童的宣传照片。我长得胖乎乎圆滚滚，大眼睛圆脸盘，被选

上了“女一号”。

照相地点是长安街上一家私人诊所，诊所的医生是一位老先生，不适合照片的宣传目的，于是就由我们托儿所的易所长装扮了量身高的医生。她年轻漂亮，齐肩的短发别在耳后，很精干很帅气。

相片照得很成功，小朋友们坐在长沙发上，笑嘻嘻地看着我，我站在磅秤上背靠一根标尺，易所长穿着白大褂，给我量身高体重。我上身没穿衣服，露出健康的小胸脯。

我的裤衩又肥又大，照相时记者围着我忙来忙去，把腰部卷了几个圈，才算合体。我腿上有几块紫药水的痕迹，托儿所才建立，设备很简陋，没有蚊帐，北京也还没有开展爱国卫生运动，蚊蝇很多，夏天我的身上总是被蚊虫叮咬得一块块红肿，不过在刊登这张照片时，紫药水的痕迹都被修版去掉了。

照片刊登在《人民画报》上，下面的说明是：“为了保护儿童的健康，人民政府已开始给孩子们进行定期的健康检查。”接着五十年代仅有的几家画报都转载了这张照片，新华社还以“新中国儿童健康成长”为题把照片发往东欧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画报。一些日记本也用照片当做插页。照片上的小朋友们成为新中国儿童的象征。



照片刊登后一年多，全国妇联收到了一封从朝鲜战场的来信。信是一位志愿军战士写的，还附有一张从日记本撕下的图片插页，上面印着那张检查身体的照片。照片下面一行字：“看，我又长高啦。”信中说：“一九五三年祖国第三

届赴朝慰问团带来的慰问品中，我的一个战友分到了一个小小的红色日记本，其中有小朋友们的照片。小本子传遍了每个战友的手，大家非常喜爱这张照片。我非常羡慕那个战友，用我宝贵的立功奖章换来了这个小本。每当我看着这张照片，心里充满力量和自豪，因为我是为保卫我们可爱的祖国和可爱的儿童在战斗。现在我把照片寄给你们，恳切请求你们帮我寻找上面那个量身高的小朋友。我多么想亲自和她通信并致以志愿军的亲切问候。”署名高殿臣。

这封信正寄对了地方，妇联轻而易举就找到了我。那时我刚刚上小学，用歪歪扭扭的字迹开始给高叔叔写信并寄了几张生活照片。高叔叔也送给我一张他的照片，一寸大小，背景是朝鲜的冰天雪地。

通信联系什么时候中断的，我记不清了，大约是在志愿军全部回国以后。几年以后我翻看家中保留的信件，发现了高叔叔寄来的第一封信，深受感动。我把他信抄在我的日记本上。我非常想与高叔叔恢复通信联系，可是志愿军已经回国，到哪去找呢？遗憾只能深藏心中。高叔叔的信在文革中丢失了。所幸的是他的照片和抄录他信件的日记本仍然保留至今。每当我看到它们，总是想，高叔叔现在在哪里？



国内也不安宁，1951年底开始到1952年，全国上下开展大规模的三反五反运动（三反：反对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五反：反对行贿、偷税漏税、盗窃国家财产、偷工减料和盗窃经济情报）。运动深入人心，连我们小孩跳皮筋时唱的都是：“猴皮筋

我会跳，三反运动我知道，反贪污，反浪费，官僚主义我也反对。”被抓出来的三反分子叫大老虎。有一次爸爸吃饭饭粒掉在桌上，孩子们立刻同声谴责“爸爸浪费，爸爸是大老虎”。但是我对老虎究竟好坏很疑惑，它不是还吃“坏人”杜鲁门呢吗？（仇恨美帝的宣传深入人心，每个小孩都会唱歌谣：“一二三四五，

上山打老虎，老虎不吃人，专吃杜鲁门。”杜鲁门、艾森豪威尔之流在我们眼里简直就是恶魔的化身。



1953年有一天，我听见一个阿姨眼睛红红地悄悄对另一个阿姨说：“斯大林逝世了。”那时我只有六岁但是也知道斯大林是中国人民心目中伟大的导师，也懂得“逝世”是什么意思，这得益于父母每天早上

醒来第一件事就是打开“话匣子”听新闻，还有我们整天唱的歌“胜利的旗帜哗啦啦地飘，千万人的呼声地动山摇。毛泽东，斯大林，毛泽东，斯大林，像太阳在天空照……”我立刻把这个惊人的消息向大家宣布：“小朋友们，斯大林逝世了！”为能抢先报告这消息而激动得声音发颤。小朋友们很懂得发生了什么事，都乖乖地不敢吭声。看见阿姨在哭，一些小朋友也哭了起来。以后的一两天阿姨带我们做小白花。

1953年的3月9日，中国政府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重大的全国祭奠斯大林仪式。托儿所的阿姨和小朋友全体肃立，胸前带着小白花，静听天安门放礼炮21响。中山公园挨着天安门，炮声把窗户的玻璃震得哗哗响。阿姨们低头哭泣着，小朋友中也这里那里传出呜呜的哭声。我心里知道这时候要严肃，要沉痛，要哭，极力想挤出几滴眼泪，无奈眼泪无论如何也出不来，我不明白其他的孩子为什么能涕泗交流，这使我心里充满罪恶感。中班一个最淘气的男孩小胖子眼睛都哭得红肿了。这个小胖子是我的死对头，我们见了面就要掐架，有一次我们扭打成一团，他竟把我的手臂咬下一块肉。后来妈妈看到了追问是怎么回事，我坚决不说，怕她到托儿所找小胖子算账，太丢脸。我心中奇怪，应该是好孩子才哭，这个小坏蛋为什么哭得这么悲伤？我并不知道斯大林有多伟大，也并不特别尊重和爱戴他，但是根据当时的宣传感到他比毛主席还“大”，是“老

大哥”，而判定这是与日常生活不同的重大事件，所以我的行为必须和其他人一致，否则似乎存在隐约的危险。我“沉痛”地低着头，始终没有流出眼泪。📷

【述往】

周扬女儿的回忆：苦难人生十二年（三）

——文革后期，渐悟等待（1972.4—1976.10）

周 密

1972年4月，七机部下放到军垦农场的最后一批人员全部回京，结束了他们三年的劳动改造生活。永定路地区的人员是下放到广州军区西湖农场，是洞庭湖中一个围垦岛，当时属常德地区汉寿县。最后走的一批约六百余人。我们4月初从柳林嘴港乘船赴长沙，此时的洞庭早已没有“洞庭波涌连天雪”的风采，水色暗黄，船行经过之处，水面并不开阔，总能看见岸或湖中泥沙沉积出的小岛和小荒滩。我们这批4月3日由长沙乘火车，次日到达北京，然后各回原单位。

六七十年代，我所约有六百余职工，其中近五百技术人员。1969年春、秋先后下放农村二百余人，其中军垦一百余人；到1972年春，从军垦陆续回京或调出了约一半（这里文意不明晰）。一般地讲，年轻一点的（35岁以下）下军垦，年纪大一点的去干校，干校每年有轮换，到1976年，95%左右的职工都轮了一遍。六十年代末，揪出了三十多个“现行反革命分子”，加上“走资派”“有历史问题”“516分子”“可教育好的子女”“知情人”以及上类人的配偶等等，全所上下至少有一半人背负着或大或小的政治包袱。这主要是工宣队、军宣队执政时期的成果，我们回来时，早已由军管会掌权了。

回来后不久，原有单位“走资派”通过什么“革委会”“核心组”之类又慢慢恢复工作了，军管会仍然有，至少每个研究室有一个，但也不太管事了，他们正忙着转业和占房子，把自己家属的户口从农村往北京转。据说中央当时批给七机部500户进京户口，本来是为解决本部人员中两地分居的，可几乎全让军管人员们自己用了。后来军管会从七机部撤出，他们的房子和家属可没撤；

他们回原单位转业、退休后，不少又回到北京。我们所就有个军管会的又回来了，所里拆旧盖新，调整房屋，不得不给他分了一套他满意的。现在老两口在菜市场摆个小摊，据说买卖还算公道，不缺斤少两，对他来讲，也是一番人间沧桑吧！我和本单位军管会从没直接接触过，只知道我们室的指导员姓邹，就是刚从军管会转业来的。调来半个月就肝硬化住院了，不过他还是来得及把妻儿办来，在北京还找了份工作，在12所住宅区占有一套房子。不久他本人就去世了，听说这个人还行，不太整人，可能是心有余力不足吧。叶华明那时是二院二室某室主任，他们室的军管人员我倒在家中见过几次。有天一大早有人敲门，说这个军管人员病重，叶华明和他们室的指导员舒兆根都赶紧跑去。原来他是喝敌敌畏自杀，尚未死，痛苦得满地打滚，口吐白沫，一身屎尿。叶和舒赶紧找了辆三轮板车，把他拉到721医院急诊室。途中从家属和知情者口中得知，他是因强暴了自己的亲生女儿，老婆从乡下来后发现，大闹，女儿也恨他，因愧疚而自杀。抢救无效。他们室的人和护士们一听原委，谁也不管，撒手走人。只好又是老叶和老舒，一个抬头一个抬脚，把满身污秽的尸体抬上运尸车，推到太平间。老舒是上海人，哈尔滨军工毕业的高材生，业务基础也很厚实，为人热诚、正直。因为他出身工人，领导就叫他改行从政，当了指导员。党员么，只能服从组织分配，不过这倒美了叶华明，配个懂技术的搭档，有共同语言，他俩关系不错。从医院回来，老叶一整天没吃饭，老舒也来闷坐了好久，两人不停地吸烟，说鼻子里老有股臭味。我说，谁叫你们是主任、指导员呢！

我举这几个例子，好像都在骂军管会，其实我相信大部分军管人员都是好人，只不过我知道的几个“具体的个人”不怎么样。十二所还有一位军管人员，和“专政队”的一位女同志(已婚)关系暧昧，受了处分，被遣送回乡了。这类事情在那个年代是屡见不鲜的。坦白地说，我觉得也不能全怪工宣队、军管会这些人。他们本质上都是农民，文化也不太高，一旦放在了对知识分子“专政”的领导地位，工作能力、个人素质都跟不上，也就跟李自成、刘宗敏进了北京差不多。历来毛主席都叫知识分子向工农兵学习，文革期间，他向知识分子聚集的单位“掺沙子”，即派工宣队、军宣队，指示“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当时，从小在解放区长大的我，是绝对拥护的，一点其他想法也没有。但这几十年的世事变化，我看到和接触了具体的工农兵群众，当他们处在贫困的被统治地位

时，他们的勤劳勇敢、淳朴善良确有可学之处。一旦地位变化，人性中自私、愚昧、贪婪、狭隘都暴露出来，一点也不比别的阶级更少。看吧，来十二所“掺沙子”的“北汽”的工宣队中，蹦得最高的那几粒“沙子”，都颇似武侠小说中那些流氓无赖，他们干的违法乱纪之事也最多。一生蹉跎，我心中已无抽象的阶级、抽象的党。无论人们的理想多么美好，都得通过具体的人来实现完成，所以人的本性是最重要的。不论什么阶级，什么阶层，什么时代，老百姓中都有好人坏人，领导集团(或统治阶层)中都有忠有奸。

1972年12月，由中央派的核心小组领导七机部，1973年9月军管会撤出。部、院、所、室各级老领导们陆续摘了“走资派”的帽，参加了各级领导小组，接着便开始“解放”第一线这批“臭老九”了。各单位都忙着平反，销毁夹在这些人档案中的大量的“揭发材料”。那年代，个人档案中放点东西是人们最害怕的，它能决定你一生的命运。要是“平反”后其中还留点什么尾巴，无异于在你未来的生活道路上放了颗定时炸弹。所以，当事人一般都要求自己看过后当面烧掉。十二所核心小组组长、原政治部张向毅主任也找我谈话，问我要不要这么办。我说反正我是风口浪尖的人，该挨揪的时候我是哑巴也得揪，不想抓的时候我说什么话也不会来抓。那时我父亲周扬还没放出来，是死是活也不知道。张主任虽也是军人出身，却是聂总成立国防科委老五院时代调来的老政工，不仅水平较高，为人也宽厚，不整人。我们有时亲切地叫他大老张。大老张听完我的意见，理解地笑了，说难得你想得开，既然你信得过我，我们就处理了。其实我是不愿看到我的同事和朋友们亲手写的那些对我的揭发材料，那是能编出厚厚一本的《周密言论集》。我在军垦农场时曾看到过其中一册，是1970年初清理阶级队伍连指导员夜审时摔在我面前桌上的，用以斥责我交代不彻底，当然不让我翻看内容。当时着实叫我吃了一惊，没想到自己说过那么多话，还全叫革命群众给回忆记录下来，估计基本上都是事实。我理解这些揭发人当年的处境，自己也不愿再受刺激，所以坚决不看这些东西。

总之，这些人平反后，又回到了原来各自的工作单位。我的顶头上司阮崇德也已从干校回来，他在办公室的角落里摆了张桌子，算是回来干他的工程组长。虽然报上天天说“抓革命，促生产”“形势大好，越来越好”，但日常的生活工作都越来越松散了。人们没了文革初期刷标语、撒传单和打派仗的劲头，

工作任务也不饱满，只有少数型号研制任务在缓慢地进行，不死不活。不少人学逍遥派，钻研烹调、缝纫、做木工打家具、组装电视和收音机等技术，办公室谈话最多的就是这些方面的经验交流。我干家务的能力在这时期也达到了这辈子的顶峰。孩子们身上穿的戴的，除了鞋袜，一年四季从头到脚，全是我亲手所做。本人最高水平体现在为自己和叶华明各做过一件军便服，难度极大。回到熟悉的办公室，熟悉的同志们之间，表面上看，好像和大家又平等了。但父亲的事，总是我心中抹不去的一片阴影。我深知我不能和别人比，不会再让我接触战略武器了，我耐心地等着把我慢慢往“外围”调。当时叶华明在二院工作，是搞地空导弹的，属防御武器，我们觉得比战略要外围一点，商量着以后转二院系统。那时年轻，勤奋好学，上班没事我就学习，到清华、科学院听课，皮毛地学了一些大学没学过的现代控制理论、最优估计理论、卡尔曼滤波、极大值原理等等。因为我认为，从技术角度上讲，二院型号的控制系统的要复杂得多，当时我认真地做了点技术储备。

时光荏苒，转眼到了1975年。这一年对七机部来讲，可以说是启动复苏的关键一年。3月，张爱萍上将受邓小平同志之托来到了七机部。老爷子精瘦，拄着一根拐杖，先到一院，走遍了基层单位，直接掌握第一手资料。也和十二所全体职工开了一整天座谈会。没多久，将军就把几个重点型号任务确定下来，七机部这台蒙尘多年的老机器又开始转动了。人们早就对多年来的涣散感到厌倦，对老爷子的大刀阔斧、雷厉风行的实干作风倍感振奋，又看到了事业的希望，对张将军本人更是敬佩有加。到十二所来那天，事先通知上午在二院小礼堂开座谈会。平时常迟到的我，那天有点兴奋，上午八点准时到了，小礼堂中木长椅还没完全摆好，灰尘老厚一层。老爷子一人端坐其中，双手拄着拐杖头。记得好像只有一个随行人员，站在旁边。礼堂门口已有几个和我一样来听会的群众在伸头探脑地等候。过了几分钟，政治部宣传科的同志们拿着电线、麦克风来布置会场。约8点15分大老张也来了，看张爱萍同志已先到了，很不好意思，红着脸上前握手。近十年来，准时上班的习惯早已消失。8点半左右，人们陆续来到会场，除了十二所职工，其他厂所也来了不少，小礼堂中坐的、站的，围了不少人，座谈会上争着发言，老爷子除偶尔提提问题外，基本不插话。

当时的十二所和一院几个单位正面临着限时全遭到三线的问题，上头的指

示说这是坚决执行“毛主席三线建设的伟大战略部署”。人员、设备等一股脑儿来个大搬家。稍有点头脑的人都会预料这将带来一场什么样的后果，不仅将大大推迟目前的研制任务进程，还有些几乎无法克服的困难。如，十二所和几个几乎天天需要协作商讨的单位技术上怎么联系？在北京每天有班车，到山沟，相距几百里，怎么办？那个最紧跟的大科学权威说：“有直升飞机和电话么”。真是开玩笑！大山沟里，修个停车场都得炸掉半座山。何况那个年代，那时的经济和技术条件。这位最著名的科学大权威是个聪明绝顶的人物。1958年大跃进时，他“通过计算证明”，太阳光的能量足以保证亩产15万斤粮食，给“高产密植”提供了“科学依据”。文革开始后，技术会议上他从不谈技术，一讲话就务虚，顺着“最高指示”说，讲得有声有色，比相声演员还来劲，但细细回味，又好像什么都没讲。他永远不用担任任何责任，这正是他聪明过人之处。

当然，当时谁敢批评“三线建设”呢？会上，就是十二所刘纪原、阮崇德这两个“炮筒”，也只能从影响重点型号研制计划的角度论述了马上全搬的不可行性。张爱萍马上表示同意，我记得他讲的大意是：搞导弹是综合性很强的科研任务，就得集中力量同时攻坚，不能羊拉屎——丢三落四，一拖就拖垮了。1975年张爱萍再次受到批判时，“破坏毛主席三线建设”是他的罪状之一。但一院几个单位（包括十二所）却躲过一劫，没有被赶到山沟里去，到了八九十年代，那些山沟里的三线单位也陆续移交地方或搬出来到大城市附近。几十年过去了，不知有没有人对所谓“三线建设”所花费用人力、财力做过统计，对其所起的作用和历史影响做过总结和研究。只能说，我们这一代搞航天航空核能电子等领域研制的人们，对其惨痛教训是深有体会的。可惜我党向来是“光荣正确伟大”的，谁要“揭老底”便视之为破坏安定团结，是大逆不道的行为，

为了让读者明白点，请允许我谈几句科普知识。什么是火箭导弹？用作投掷武器弹头的一般叫导弹，用来发射卫星或其他航天器的叫运载火箭。技术实质上差不多。火箭或导弹本身，我指飞上天的这部分，它的设计主要分三大系统：总体结构、发动机、控制系统。控制系统主要有制导和稳定系统，以及为完成这两个系统指标的一切仪表设备，也包括发射前地面发射控制系统。我的专业是设计稳定系统，就是让弹按照一定的姿态飞行，所以美国等西方国家称之为姿态控制系统。在我们看来，导弹可不是个硬铁棒，而是个质量分布不均

匀的软面条，控制起来并不容易。1962年，我国第一发自行设计的导弹飞到半途栽了下来，就是对其“面条性”认识不足，行话就是“弹性震动问题没解决”。之后，以十二所理论研究室（一室）为主的同志们，夜以继日，群策群力，终于找到了失败的原因。从此，我们一院的型号再没有因设计问题出现过失误。这份功劳和成果，绝对是属于一院十二所的青年技术人员们的。当时一室技术骨干们的平均年龄不足30岁，那种齐心协力、无私忘我的团队拼搏精神，从文革起到现在，再没出现过。我认为以后也不会有了。我们这代人年轻时是为着信仰和事业活着的，大部分人能称得上是“拼命三郎”“老黄牛”。我个人当时调一室不到一年，又生了小孩，还够不上技术骨干，这件事上我毫无贡献。1978年全国科技大会，把解决这次关键问题列为国家一等奖，可惜功劳算在了那个大权威的一位得意门生头上，本来他是与此事毫无关系的。一室的人们看了报道大为震惊，议论纷纷，在领导和权威说了算的时期又能怎么样呢？好在当年的功臣们现在基本健在，当年领着大家奋力拼搏的黄纬禄、梁思礼、陈德仁等人还在，要想核实真实的历史并不难，就看共产党敢不敢承认自己也有搞错的事情了。

言归正传，再回到1975年春天，随着政治形势的发展，好像把我调出的迹象越来越少了。我热爱自己的工作和专业，周围的同事们对我也很友善、了解，我本身当然哪儿也不想去。阮崇德已升任研究室主任，他分配我负责某运载器的稳定系统设计，这个任务并非重点，我的工作也不饱满。张爱萍来过之后，有个搁了7~8年的型号又要启动继续研制了。但这时搞稳定的负责人调离或转到重点型号上去了，只剩下一个文革前夕调来的同志。虽说也来了快十年，却不是搞运动就是被下放，没来得及学会设计。分工抓此型号的副主任姓金，是设计校正网络和滤波器的大专家，他总是毫无保留地向室里所有请教他的人传授方法和经验。我也是其中之一。这年春天科技处天天拿着计划来催他，老头子着了急，叫我帮帮忙，这一帮可就陷进去出不来了。开始我也犹豫，保密规则放在哪儿，何况我身份特殊，明摆着属于被限制使用之列，怎么能随便介入别的、特别是武器型号的任务中去呢？去问阮崇德主任，他这个人鬼精，说：“这个型号金主任分管，我不过问。金是非党员，上面也不能把他怎么样。”我又向金主任谈了自己的顾虑，他说：“我反正是非党人士，没人跟我讲不能用你，

政治部怎么用干部我怎么知道？工作需要人，你就干吧！”就这么着稀里糊涂上了船。到了1975年夏以后，我父亲从秦城出狱，毛主席对他的批示在下面也有所传闻，我们都觉得风险小了一些。到了1976年初，该进行飞行实验。去靶场实验队成员的名单要所、院两级批。按惯例，第一次必须有搞稳定的人去，于是所领导小心翼翼地把我写入工作队名单，报到院里。从技术角度讲，“稳定是飞行成功的前提”，院技术领导和型号总工程师支持我去，可签字批准的领导是要担责任的。怎么能让一个黑帮子女，政治上不可靠的人去靶场呢？于是再上报，上面定。一报报到七机部强晓初副部长那里。说来巧，他在延安时，曾做过我父亲的部下，1975年也住在万寿路中组部招待所，有次陪父亲在院里散步我还见过他一次。爸爸说，强晓初曾是陕甘宁边区最年轻的县长（18岁），1947年胡宗南进攻期间，他和马文瑞等同志负责一野和中央的后勤粮草，几百万担粮食经他手转运给部队，那时他们经常连续几天不睡觉。我这么个普通实验队员还弄到部里去批，大概绝无仅有。他批准了。这个过程我是后来从别处知道的，以后我再没见过强副部长。至今我还很感谢他。如果毛主席去世后“四人帮”掌了权，这就会是他的一条罪状。既然1976年我可接触机密，到1977、1978年，届时父亲尚未解放，我又两次去其他基地出差，领导都敢批了。再往后，1978年底父亲彻底平反，我才又回到了七机部的核心圈。

尽管1975年冬又开始批判“右倾翻案风”，张爱萍也被叫回去挨批判了，但他所启动的七级部这台老机器却没停下来。这时工宣、军管这些“沙子”们早走了，政治活动由原来七机部政工处来抓，每星期一天的政治活动仍雷打不动，不过人们对此却失去了兴趣。每次所里开大会，台上念文件、讲话的人口干舌焦，下边群众看“参考”、聊天、打瞌睡。我们室有届指导员叫武临春，每逢政治学习开会，念完文件报纸，没人发言，他就自己开讲，直到散会。我这个人说话直来直去，有次散会后半开玩笑地说：“你这车轱辘话啰嗦个没完，有几个人听？我坐得腰酸背疼，能不能早点儿‘解放’我们啊？”他说：“政治学习是上面安排的，你们不愿意发言，我替你们讲了，叫你休息休息还不好？”真是个体谅大伙儿的老好人。有时开会，大家集中在一个办公室，倒可以在下面嘀咕嘀咕小道消息。特别是76年1月8日周总理去世后，人们心中更恨江青。文革进行了近十年，人们早已厌倦了没完没了的“批判会”，盼望着形势发生变

化，因而即使嘀咕得有些出格，一般人也不会像六十年代那样天真地揭发自己的同志了。

实验队1976年3月28日出发，到达东北某基地。到了不久，就发生了“四·五天安门事件”。我们停了一天工作，由基地部队和七机部实验队组成的游行队伍在山沟里的公路上转了半个多小时，然后开大批判会，找了几个代表上台念几篇批判发言，喊了一阵“打倒邓小平”等口号，算是完成了上级领导的布置。人们既无奈又懒散，散会后就回到工作岗位。这个基地也因文革闲置了好几年，要重新检查那些设备，也颇费些功夫，所以一直拖到五月下旬才发射，5月25日回到北京。

70年代的基地和现在的可不能比，技术设施在当时还算过得去，生活条件可真够艰苦的。我们住的招待所是平房，大通铺。三月底的东北冰雪盖地，我们住房内的干打垒墙上一层水珠，所以到达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劈木头烧炉子暖房间。木头都是湿的，不好点，几个人烟熏火燎忙了几个小时后，到睡觉时墙上的水珠才消去，留下块块黑斑。木板大铺阴冷，大家都把借给每人一件的老羊皮军大衣垫在褥子上面，棉衣棉裤搭在被子上，穿着毛衣毛裤袜子睡，还冻得够呛。这么住了5~6天，屋里才算有了点人气，后来天气转暖一些，才慢慢习惯了。到部队出差，最不方便的是没有专门的女厕所，通常在原男厕所中间隔一张席子，两边的全部听得一清二楚，所以，女同志往往比男同志更为神经紧张，不自在。白天，我们在工作场地就上这种“半边厕所”。住地的女厕所是个周围围了一圈席子的大坑，在离住房不远的山坡上。小路上雪水泥泞，一不小心就会滑一大跤，所以临睡前，我们都集体行动，穿着38号的大毛皮军靴(每只能有2斤重)，打着手电，手拉着手，跨沟过坎，我们开玩笑管这叫“小长征”。

在基地天天接触的是实验队中其他单位的技术人员和工人师傅以及部队的干部战士。一起工作没多久，大家就都混熟了。在北京有工人、解放军和臭老九之分，到了山沟里，面对技术问题，大家就成了同志和朋友，忘记了阶级斗争，没有了对“臭老九”的歧视和不信任。基地技术干部中有好几个是哈军工毕业生，他们以前也去过我们所了解设计情况，也算熟人。有时晚上下班后，我们也去他们住处坐坐，讨论讨论白天存留的技术问题，或是聊聊天，打打牌。基地技术总指挥葛文楣同志住处，晚上常有人去，他也是哈军工毕业的。我觉

得他是个典型的知识分子，大概正因为如此，名义上只能当副总指挥，因为党是要指挥枪的么。连排级干部战士的友善更表现得具体。实验队食堂伙食不好，老是陈高粱米加熬白菜。部队食堂改善伙食时，小战士们常常悄悄带出些好吃的包子大饼之类给我们。有次黄昏，十三所王惠敏拉我到战士食堂窗下等候，一会儿，从里面递出两大包用报纸包着的油条，我们屋几乎每人分到一根。解解馋是次要的，战士们的心意，我至今没忘。

在山沟住了些日子，生活慢慢习惯了，除了时常思念孩子以外，我觉得过得不错。五月份以后，天气转暖，初春的原始森林很美。最初，地面上看似冰雪覆盖，冰雪之下潮湿的泥土上长出小草小花，生机盎然。雪消冰化净，满地野花随风摆舞。落叶树变嫩绿，松柏发新芽，深浅绿色相映，气味芬芳。林子里有种小松鼠，俗名“五道眉”，不太惧人，扔点葵花子、松子就跑过来，吃得两腮鼓鼓。节假日，我曾出山沟到县城去过一次。我们还参观过养鹿场、人参种植场，既长了不少知识，和淳朴的山里人打交道，又着实享受了两个月远离阶级斗争的平和宁静。

胜利完成任务，5月25日回到北京，又掉进政治漩涡之中。到单位上班没两天，就有好几个同志悄悄叮嘱我讲话要小心，说幸好我四月不在北京，上面来查问天安门事件时，好几次问到过我，所里都回答说我表现很好，工作积极，正在出差，没有任何抵触情绪等等。

回北京第二天，家里人都上班上学走了，我正在收拾东西，叶华明室的郝如惠来看我。我下放期间，两个年幼的孩子和华明留在北京，郝常常去关照帮忙，她是个很热情又乐于助人的同志。这次来看我，她一脸严肃。她说，华明四月五号带孩子们去了天安门，照了相，被好几个人看见了，不得不“揭发”。叫我赶快把家里清理一下，有底片快曝光，有诗抄快烧掉。另外前不久华明说话不注意，说了不少邓小平的好话，叫他写检查他也不好好写，怕是很难通过，叫我务必劝劝他。于是我马上着手清理家中，果然找到一卷未冲洗的胶卷，想想，拉出来曝了光。女儿阳阳抄写得整整齐齐的一本天安门诗抄，被我从床垫下翻出来，没舍得烧，又放回原处。华明下班回来得知胶卷曝光，和我吵了一架，骂我胆小。我说，我自己什么没经历过？这都是为了孩子们。他不吭气了。我又劝他写检查，他拿出几页底稿给我看，是份根本不可能被通过的东西。例

如，他说那天不是专门去天安门，而是去他大哥家“路过”。我说大哥住在西便门，你从永定路出发，怎么个“路过”法？说不圆么。至于对自己“错误言论”的批判检查，更是充满矛盾和漏洞。我一指出，他就直着脖子和我争论起来，我说现在不是叫你和谁去辩论讲道理，是叫你写检查，说圆了上下都好通过。他又犯倔不吭气了，最后扔下一句话：有本事你写！于是我只得连续几个晚上替他写。好在我早已锻炼成写检查交代的老手，反正想法子把话说圆了，使劲上纲，多搞语录，洋洋万言写十来页纸，就比较好通过。果然他抄了交上去，总算过关了。

从1975年冬开始，万寿路招待所的气氛也越来越凝重了。那年初冬聂力约我见了一次，那时她已离开七机部调到海军，在公主坟上班。我在办公室接到她的电话（我家里没电话），马上骑车赶到万寿路口等她。我们在马路上遛不到十分钟，她说现在形势比较紧张，叫我说话注意点，有两个以上的人在场时，莫谈国事。也转告叶华明别乱讲，即使对亲兄弟也不能信口开河。周总理去世后，全国笼罩在一片愁云惨雾之中，万寿路招待所的老干部们更是悲痛不已。春节前不久，我去那儿探望父母，在大门口正好碰上聂力出来，她是提前来给这院里的叔叔阿姨们祝贺春节的，又叫我转告父母，今年（1976年）春节在家好好呆着，不要外出串门拜年。5月下旬回京后，我照例周末去万寿路，陪父母散步聊聊天什么的，当时听到消息都是江青等人权力越来越大，邓小平又一次被打倒，更使我们对中国的未来忧心忡忡。

1976年，中国历史转折的一年。从1月8日周恩来总理去世，4月5日天安门事件，7月朱老总去世，7月28日唐山大地震，9月9日毛主席去世，10月6日“四人帮”被抓起来，人们尝遍了哀恸悲伤、愤怒绝望和欣喜若狂的各种滋味。还是让我回忆一下这辈子最高兴的一天吧！1976年10月8日下午，我正在办公室伏案工作，我们研究室的林金在门口探头，招我出去。到走廊上，他叫我下楼，我看他的神情，知道一定出了大事，尾随下楼到放自行车的地方。他看看四周无人，第一句话就是：“江青、张春桥他们给抓起来了！”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忙说，先别乱传，这消息得核实一下才行。他激动地结结巴巴，喘气都不匀地说，小罗（他爱人）是从两三个渠道得到的信息，估计不会错，她现在又进城找熟人打听去了。我们压抑着兴奋的情绪，推着自行车边说

边走，反复推敲消息的可靠程度，最后决定马上到万寿路中组部招待所我父亲处，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们。在去的路上，隐约听见远处有鞭炮声，更加坚定了推断。招待所只爸爸一人在家，他们也听到了些风声，所以妈妈进城去核实和了解情况了。等了一会儿，她回到家，打听到了也只是一些“传闻”，不过回来路上，她见街上新刷了不少庆祝“除四害”胜利的标语。这种标语通常是春秋两季卫生运动时常见到的，不属政治标语范畴。这一来，我们更相信这些“传闻”了，大家高兴地分析，议论到六七点，才想起来要赶紧回家做饭，孩子们该早放学到家了。我们急忙蹬上自行车往家赶，一进门，林金的爱人小罗也正在我家和叶华明说着呢，近一年来老沉着脸的华明现在两眼放光。不记得那天晚饭胡乱吃了些什么，反正大人孩子都欣喜若狂，我们反反复复的重复：这下中国有救了，这一下我们的苦日子熬到头了。

至此，十年浩劫的苦难算是基本结束了。但当时我没料到，命运给我安排的磨难还远远没有结束，只好等下一篇拙文细细讲述了。❏

【书摘】

从哲学教授到恐怖分子

——毛泽东思想的秘鲁传人冈扎洛

程映红

上个世纪60年代末，就在文革初期的学生造反和派性武斗在中国各地被上山下乡和军事管制取代的时候，它们却在太平洋彼岸的秘鲁重演了。秘鲁中部的阿亚库巧地区是个相对贫穷的山地，这里有一个华曼嘎大学，历史很悠久，原来是天主教学校，后来秘鲁政府把它变成国有大学，面向当地的青年招生。在60年代红色风暴中的拉美，这个大学成为有名的学生运动的中心。

当时华曼嘎大学的校园中，学生和一些年轻教授分成两派，一派支持原来的秘鲁共产党，以秘共党刊《红旗》为名，另一派支持从这个党中分裂出来的

“光辉道路”派，以这个派别的刊物《光辉道路》自称。前者被认为是“苏联修正主义”在秘鲁的代表，而后者则是自命为“中国毛泽东思想”在秘鲁的传人，他们都认为自己是正宗的秘共，相互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两派在形形色色的辩论会和讨论会上指责对方是叛徒和修正主义，散发传单和小册子，张贴诽谤性的告示，在各自的刊物上发表冗长的充满了领袖和导师语录的论战文章，最后发展到在会场外面拳脚相向，一派占领学生宿舍，另一派调兵遣将来围攻，展开了武斗。大学校园里涂满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冈扎洛思想万岁”“冈扎洛主席万岁”“打倒一切修正主义”之类的标语。

十多年后，80年初，当中国不但结束了文革，而且开始了改革开放的时候，秘鲁首都利马的大街上，几条死狗被头朝下吊在树干下，血淋淋的身上贴著纸条，上面用西班牙文写著一个中国人的名字：邓小平。与此同时，中国驻秘鲁大使馆受到炸弹和手榴弹的袭击。暗杀，袭击警察局，破坏选举站等暴力行动在秘鲁的城乡频繁地发生，“人民战争”的传单在大街小巷雪片一般飞舞。

如此仇视结束文革主张改革的中国领导人的就是原来的那个秘鲁共产党的极端派别“光辉道路”，其领导人就是那个“冈扎洛主席”。冈扎洛主席”的真名叫古兹曼（AbimaelGuzman Reynoso），冈扎洛是他投身革命后为告别旧我起的名字，尤其是在他成为党的领导人之后。在“光辉道路”的党内文件中和集会场合上都用冈扎洛，党员在提到他用“冈扎洛主席”。用这个名字本身就代表了敬意和服从，是一种政治表态，只有党外人甚至敌人才用他的本名。除了这个“党的名字”，古兹曼在党内有两个称号。一个是“Puka Inti”，在南美安第斯山印第安人的语言中是“红太阳”，表明他自命为秘鲁人民的伟大领袖。另一个称号叫做香波。香波是用来洗头的，党员们用这个词来表示他们的领袖会给人做思想工作，即洗脑。从1980年到1992年，古兹曼领导的“光辉道路”利用秘鲁社会的严重不公，发动了一场以文革哲学思想、造反理论、痞子精神和血腥暴力为基础的“人民战争”，最终堕落为一个世界闻名的恐怖组织。

然而，这个暴力恐怖集团的头子原先却是一个文质彬彬的哲学教授。他毕业于秘鲁有名的圣奥古斯丁大学哲学系，毕业论文是关于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的空间理论。他从这种哲学训练中吸收了一套宏大壮阔而又不着边际的哲学思辨和辩证法概念游戏，形成了一个自以为掌握了宇宙终结真理的极端自负的个

性。60年代初大学毕业后，古兹曼加入了秘共，被聘为华曼嘎大学的助理教授，负责秘鲁共产党在这里的青年工作，领导激进学生做社会调查，和大学周围的贫穷社区联系，利用大学自治的制度和独立的学生组织招募和培养激进分子，为发动革命打下组织基础。

古兹曼投身革命时正赶上国际共运以中苏两家为首的派性斗争。在这场全球范围的文革中，全世界的共产党都要重新划线站队，许多国家的共产党因此一分为二，造反夺权不成就另立门户，秘共也不例外。阿亚库乔党部也展开了路线斗争。听命于苏联的一派在党的会议上挂起了马，恩和列的三大圣像。古兹曼挺身而出把被赫鲁晓夫在苏联拿掉的斯大林的相片挂在了列宁旁边，于是成为秘共反修派的代表。

文革初期，古兹曼在中国受训，亲身经历了轰轰烈烈的个人崇拜和造反，又吸收了“只要思想对头了，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枪也可以有枪”的江湖绿林唯意志论哲学。大约在1967到1968年之间，古兹曼潜回了秘鲁，很快成为阿亚库乔地区党的领导人。他那哲学教授的派头加上新近从文革取回的真经，使得他成为党内独一无二的理论大师和指路人。西方经典和东方玄学相结合，他的长篇政治演说和思想教育让那些半文盲的党员们听得既不知所云，又如醉如痴。他说党主席帕德雷斯是取消主义分子，因为他主张议会斗争，造他的反，很快就形成了听命于自己的“光辉道路”派。

古兹曼一当上“冈扎洛主席”就正本清源，重新解释党史，以他为界标往前追述历史，划出一条红线和一条黑线，并在党内搞整风，清除了一个叫卡瓦塔的党内竞争对手。他还组织干部学习文件，统一思想，和错误路线划清界限。他说从1930年党的创始人去世后，秘共就开始犯倾向性错误，一直犯到60年代。但在此过程中党内的正确力量不断进行斗争，最终在他冈扎洛主席的领导下才战胜了错误倾向，确立了一条正确路线，从此秘鲁革命的胜利才有了保证。古兹曼照搬中国革命的理论，分析秘鲁社会的性质，说秘鲁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党的最低纲领在目前是为实现“新民主主义”而奋斗。

“光辉道路”在七十年代末以前一直处于发展和扩大组织的阶段，还没有展开直接行动。推动这个革命党通过暴力行动在秘鲁社会登场作政治亮相的，是一个来自大洋彼岸的事件：中国结束了文革，开始了改革开放，这对无比崇

拜文革的古兹曼来说有如晴天霹雳。同时，中国还和秘鲁的军人政权建立了外交关系。古兹曼愤懑不已，认为这是国际共运中苏联赫鲁晓夫反斯大林之后的又一次变修。有一段时间里他曾经想和阿尔巴尼亚的风中之烛恩维尔·霍查接上组织关系，但阿尔巴尼亚人对“红旗派”更有兴趣，他只好作罢。古兹曼总结中国“变修”的经验，得出了一个结论：毛泽东用文革来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和党内出修正主义，但他做得不彻底，斯大林更不彻底，所以他们死后国家很快就变了颜色。为了反修防修，文革这样的运动必须经常化制度化。秘鲁革命虽然眼下是新民主主义，但必须从一开始就要考虑将来革命永不变色的大问题，甚至在夺权以前就要着手进行准备。

这个“光辉思想”后来被称作“冈扎洛主席的指导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的第四把刀子”。这个说法来自于毛泽东发动反修斗争时的一个比喻：苏联人把斯大林这把刀子丢了，列宁这把刀子也丢得差不多了（马恩则是第一把刀子）。70年代中期，红色高棉的波尔布特已经认为中国文革不彻底了，当时毛泽东还在世，这就是他1975年一进城就全盘摧毁城市文明和社会基础结构的理论背景。在太平洋彼岸的安第斯山下，古兹曼也得出了相同结论，可惜略晚了数年，这个理论的首创权不能归他。正是在中国“红旗落地”的大背景下，古兹曼觉得世界革命的火炬现在传到他手上了，他就是当代的列宁和毛泽东。因此，“光辉道路”必须挺身而出，反击世界范围内的修正主义逆流，在秘鲁发动暴力革命。

从那时开始，“光辉道路”的会场上，古兹曼那长发和大胡子的像被挂在了马恩列毛之后（甚至斯大林都还排不上）。“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冈扎洛思想”成了“光辉道路”对自己理论基础的标准提法，表明只有安第斯山下的冈扎洛主席才是马恩列毛在当代世界五花八门的左派中的一线单传，红色教会中硕果仅存的先知。古兹曼发动“人民战争”的社会背景是：自1968年起在秘鲁掌权的军人政权采取了一些改革政策缓和社会矛盾，如国有化，农业改革，对政治犯循法律程序进行处理等等。秘鲁军人政权的这些变化甚至受到了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的称赞。在多数左派都缓和与政府的关系，寻求在体制内变革社会的时候，只有“光辉道路”认为现政权是法西斯主义，用假改革来剥夺左派用来号召人民的资本。

七十年代末，军人政权准备把权力交还给文人政治家，在全国筹备选举，

多数左派都准备参加选举，只有“光辉道路”把选举看成大难临头，在秘密地为暴力斗争作准备。党内有一些老战士也受到了“和平过渡”思想的腐蚀，对“人民战争”持有异见，古兹曼毫不犹豫地将他们开除出党。

1980年春，“光辉道路”展开了他们声称的“人民战争”和“持久战”。“光辉道路”的第一次暴力行动是袭击一个乡村的选举站，砸毁选票箱，烧毁选票。他们在秘鲁首都利马的第一次暴力亮相是1980年六月，组织了200人用莫洛托夫鸡尾酒瓶（燃烧瓶的别称）袭击一个区政府。之后，他们对交通和电力系统进行断断续续的袭击，造成交通中断或大面积停电。他们也选择偏僻地区或孤立无援的警察局或地方政府下手。他们的另一个经常性的目标是地区性的选举办公室，摧毁选票箱，杀害官吏和候选人，威胁选民。

从1980年到1992年，“光辉道路”的暴力行动使得秘鲁社会付出了沉重代价，数十万人死亡，许多社会基础设施被摧毁，一些地区陷于瘫痪，成千上万农民逃到城里。全国上下被恐怖活动搞得人心惶惶。一些曾经同情“光辉道路”的秘鲁农民逐渐对无节制的破坏和毁灭感到厌倦，对用暴力迫使他们“革命”的行为深感恐惧，很多地方的农民响应政府号召组织起了民间自卫委员会。这就使得“光辉道路”的暴力行动更加不分对象，全社会都成为他们报复的目标。

1990年6月“光辉道路”袭击了阿亚库乔地区黄塔的一个农民村社，屠杀了20个农民，包括妇女和儿童，还烧了40所农居。这一事件震惊了全国。类似的打砸抢烧的行动有很多。在一些地方，“光辉道路”的武装分子拦下公共汽车，从车上把乘客赶下后集体屠杀。他们特别仇恨民主选举，甚至把一些参加投票的农民的食指砍掉（秘鲁的投票方式是用食指在选票上按指纹）。“光辉道路”袭击和破坏的对象还包括大学在农村的实验基地。这样，“光辉道路”就从最初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大众不满的政治暴力组织变成纯粹为暴力而暴力的政治恐怖团伙，其社会基础大大萎缩。

1992年8月，秘鲁警方一举破获“光辉道路”的领导集团，古兹曼本人也被捕。消息传出后，秘鲁全国都像是一颗久悬的心终于落了地，世界舆论也纷纷对这个拉美的重大事件进行深度报导，中国报刊也透露出这个恐怖分子曾经在文革时期在华受过训练。至此，“光辉道路”变成了穷途末路。如果说毛泽东的革命确实轰轰烈烈地闹了一场，改变了全体中国人的命运，那么古兹曼的“光

辉道路”只是一个拙劣的摹仿，一出人见人厌的闹剧，一场不折不扣的动乱。❷

卡斯特罗的成功秘籍

——“我通过纽约时报找到了工作”

程映红

在俄国和中国革命中，约翰·里德和埃德加·斯诺是两个立过大功的美国人。里德十月革命发生时在俄国，后来写了《震撼世界的十天》，成为在西方宣传俄国革命的第一部也是最有影响的著作，列宁亲自为这本书的俄文版写了序。斯诺1936年去延安，1938年出版了《西行漫记》。把中共领导人描写成罗宾汉式的传奇英雄。这本书至今还是中共党史教育的好教材。并非巧合的是，在古巴革命中，也有一个为卡斯特罗立下大功的美国记者。他的名字叫赫伯特·马修斯。

事情要从1956年底说起。当时卡斯特罗带领人马从墨西哥到古巴，在马埃特腊山区打游击。这里远离城市，人烟稀少，而且被政府军封锁，不能产生全国性的影响。当时巴蒂斯塔独裁政府不但实行新闻封锁，不许报道卡斯特罗的情况，而且散布谣言，说卡斯特罗已被打死。卡斯特罗于是想出了利用西方新闻媒体为自己作宣传的奇招，他派游击队的地下工作者找到了当时正在哈瓦那度假的纽约时报记者赫伯特·马修斯。

马修斯是资深记者，报导过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和西班牙内战等20世纪重大事件，新闻嗅觉非常灵敏。在拉美，他曾经化装成阿根廷人到监狱采访被政府非法关押的学生，事件披露出来后迫使政府将这些学生释放。他知道卡斯特罗领导的反独裁政府的七二六运动在美国得到广泛的同情，于是立刻决定冒险去采访。多年后他回忆说：“我是想让那些年轻人看看，一个五十七岁的老头还能抢新闻。”

1957年二月初，在“七二六”运动地下组织的严密掩护下，马修斯和妻子化装成想在古巴购买农场的美国商人来到马埃特腊山区。象很多第一次见到卡斯特罗的人一样，马修斯和卡斯特罗一照面就被他的个人魅力所倾倒，他这样

写道：“他是条汉子，身材强壮，六英尺多高，紫铜色皮肤，脸庞宽阔，胡子浓密……穿着一身橄榄绿军服，挎着一支他引以为豪的装有瞄准镜的步枪。”

卡斯特罗把这个美国记者奉为上宾，端出咖啡、番茄酱和三明治来款待，并和他作了彻夜长谈。卡斯特罗不但深知纽约时报的影响，而且懂得如何去迎合美国读者的口味。因此他大谈反独裁争民主，许诺说如果他的革命胜利，一定马上恢复被独裁政府取消的宪政民主，举行大选。他还说他的政府将保护私人企业，特别是外国投资。在采访结束时，为证明采访的真实性，卡斯特罗还在马修斯的采访笔记上签了名。卡斯特罗手下的人并给他们拍了照片。

马修斯当了几十年的记者，但还从来没有一次象采访卡斯特罗这样让他感到冒险和刺激。回到哈瓦那后他立刻将这个�息通知了纽约时报总部，总部告诉他将把这次采访作为重大新闻来处理。在离开古巴回美国时，为了防止海关军警的检查，马修斯的太太将采访笔记藏在了自己的胸罩里。


1957年2月24日，纽约时报的星期刊用显著版面登出了马修斯长篇采访记的第一部分：“菲德尔·卡斯特罗，古巴青年起义者的领袖，仍然活着并在崎岖的马埃特腊山区英勇地战斗着。”采访记并说卡斯特罗的理想是“自由、民主、社会正义、恢复宪法和自由选举。”

报道立刻在美国引起轰动。当独裁者巴蒂斯塔得知这个消息时如雷轰顶，立刻下令从把从海关进来的纽约时报的有关版面剪掉，于是那份纽约时报到读者手上时被开了天窗。古巴政府说这份报导是西方媒体的捏造，粗暴干涉古巴内政，为反政府的罪犯提供宣传。古巴国防部长坚持说卡斯特罗已被打死，并讽刺地说既然马修斯先生是个老记者，他怎么忘了给卡斯特罗拍张照片呢？他没有想到的是，下个星期的纽约时报在发表采访记第二部分时附了一大张照片：卡斯特罗在点烟，马修斯在做记录。纽约时报还把古巴政府反驳自己的声明也照样登出。古巴政府十分尴尬，巴蒂斯塔无奈之下只好命令手下人放下剪刀，于是很多古巴人看到了这份报道的第二部分。

马修斯的这份报导在纽约时报连登了三个周末版，轰动了美国、西方和拉美新闻界，为卡斯特罗做了世界性的宣传，树立了一个活生生的反独裁争民主的英雄形象。此后，西方新闻媒体不断派人冒险前往卡斯特罗的营地继续采访。1957年五月，美国最大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对卡斯特罗进行了电视采访，又一

次引起轰动，采访记者罗伯特·泰伯深受卡斯特罗影响，古巴革命后，他前往哈瓦那专门帮助古巴做宣传工作。芝加哥太阳报和芝加哥论坛报也于同年派记者前往马埃特腊山区采访，纽约时报还于1958年再次派员采访，写出了系列报道。此外欧洲和拉美的报刊也加入了采访的行列。

纽约时报和其他报刊电台对卡斯特罗和古巴革命的报导使得美国同情古巴革命的人大大增加，不但帮助了卡斯特罗在美国募捐和收集武器，而且使得美国政府在公众压力下逐步放弃对巴蒂斯塔政府的支持，最终造成了它的崩溃。因此卡斯特罗1958年曾经在一封给马修斯的信中说：“我们急切地期待着有机会让我们的人民能向所有这些有勇气的记者致以民族的敬礼，他们用慷慨而高尚的笔墨帮助古巴人民恢复了自由。”

然而，卡斯特罗上台后不久，人们就发现他那些自由民主的许诺都是空头支票，于是纽约时报和马修斯开始遭到围攻，认为他们上了卡斯特罗的当，替他作了义务宣传。美国民族评论杂志登出了一幅漫画：卡斯特罗笑眯眯地坐在古巴地图上，文字说明是：“我通过纽约时报找到了工作。”

卡斯特罗培育超级母鸡和种牛的故事

程映红

世人都知道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是个游击英雄和反美好汉，但很少有人知道他还是一个曾经化了好几年时间想培育出超级母鸡和超级种牛的畜牧迷。

话说60年代初，卡斯特罗的革命搞了没几年（卡斯特罗1959年一月夺取政权，1960年大举国有化，1961年生活主要物资实行配给制），就把一个物产富饶的热带岛国折腾得样样东西都要凭票，尤其是鸡蛋和牛奶，只有老弱病残才有保障。卡斯特罗虽然嘴上说都是美国佬的封锁把古巴人搞的没肉吃，但他心底里也觉得不对劲：美国佬的技术再先进，也封锁不到古巴的鸡屁股和乳牛的奶头吧？

1963年卡斯特罗访问苏联，赫鲁晓夫让他看了一个又一个波将金式的集体农庄和工厂，向他吹牛说苏联人平均每天有二磅面包，把卡斯特罗的心说得直

痒痒。西伯利亚的社会主义能办到的，热带岛国的共产主义凭什麼办不到？回国后他宣布1964年是经济年，1965年是农业年。为了取消鸡蛋和鸡蛋的配给，他亲自畜养家禽家畜，想培育出高产新品种。他要让世界看看，古巴革命就是《圣经》上说的创世纪，他就是造物主。

那段时间里，卡斯特罗的房间里堆满了有关畜牧和家禽业的书。有一次一位意大利出版家到他住处商谈出版他传记的事，见到许多良种的莱克亨鸡在卡斯特罗的房间里进进出出，如入无人之境。卡斯特罗以一种父亲般的自豪说，他正在用自己的方法喂养这些母鸡，观察它们每天到底能下多少蛋。

卡斯特罗对饲养牛的兴趣更大。他打算建立八个大工厂生产酸奶，说这对胃和消化都有好处，而且营养丰富。此外还可以生产奶酪。他甚至觉得古巴应该成为世界第一产奶大国，奶制品的质量要超过荷兰，产量要超过美国。

卡斯特罗不论做什麼都要与众不同，对如何培育奶牛他也有自己的想法。他不同意当时拉美畜牧业已经普遍采用的圈养法，认为那不自然。当他听说法国农学家伏以辛也主张自然放牧时，立即派人去西班牙大量购买此人著作的西文译本，用飞机运回古巴，还请伏以辛来古巴开讲座。伏以辛来后，卡斯特罗亲自出面招待，出席他的讲座，还带着客人到处参观。伏以辛忙得不亦乐乎，结果在参观一个国营农场时心脏病突发死了。

伏以辛死后卡斯特罗又从英国请了两个农学家来主持新建的动物科学研究所。但他们与卡斯特罗意见不合，他们也主张发展圈养的肉牛，认为古巴不具备自然放牧的条件，而且他们对卡斯特罗事无巨细的干预深感厌烦，最后挂冠而去，临走时诅咒说古巴只有把卡斯特罗暗杀了才有指望。

但这些都没有动摇卡斯特罗对养牛业的兴致和让古巴成为世界第一产奶大国的雄心。他的注意力又从饲养方法转到了古巴奶牛的品种上来，忽然发现古巴本地的牛虽然适应热带气候但产奶量低，于是下令化巨额外汇从加拿大进口了世界良种霍尔斯坦牛。这种在寒带长大的奶牛一到热带的古巴就纷纷倒毙，于是卡斯特罗又下令为它们造空调牛棚，但还是死了很多。

为什麼不可以让这些加拿大公牛和古巴母牛交配呢？卡斯特罗又冒出一个新主意。这个办法证明有些效果，交配产下的杂交种虽然产奶量不怎麼样，但能适应古巴的气候了，这是一个伟大成就。于是卡斯特罗热心地计算每头加拿

大公牛每年可以和多少头古巴牛交配，一些加拿大牛因操劳过度而早死。卡斯特罗脑子一转，又想到利用先进的人工授精技术。于是数年间古巴一下冒出好几个种牛授精中心。卡斯特罗以古巴种牛之父的身份给这些杂交牛起了个“古巴F-1”的名称。

当时每年人工授精和生育多少头杂交牛成了国家计划，报纸头版经常有“明年的计划——人工授精XX万头F-1牛”这样的大幅标题。忙活了一阵总算有了收获的卡斯特罗十分兴奋，1968年向荷兰记者夸口说十年内古巴将向以良种奶牛著称于世的荷兰出口种牛。

在那几年里，卡斯特罗频繁出没于哈瓦那省的畜牧中心，那是他个人给公牛取精为母牛授精的实验室，也是他向外国客人展示他的杂交牛的展览馆。他要让外国客人在这些杂交牛的身上看到一个新的古巴。

1967年9月，他驾着吉普车把越南党政代表团带到那里，越南付总理让卡斯特罗和高大的种牛站在一起，拍下照片，要带给胡志明。卡斯特罗还兴致勃勃地把他们带到给牛人工取精和授精的实验室，观看了整个操作过程。11月，他又驾车把以国家主席崔庸健为首的朝鲜党政代表团带到这里，先是参观了整个畜牧场和实验室，然后请客人从显微镜里观看采集到的牛的精子。1968年11月，当他把东德党政代表团带到这里时他骄傲地向他们介绍了一头叫“塔罗”的重两千五百四十磅的种牛，说它一年的生产力足以让两万头母牛受孕。古巴党报《格拉玛报》说外国客人都为卡斯特罗对技术细节如此精通而深感佩服。另一头曾经为古巴获得国际博览会奖牌的叫做布兰卡的种牛甚至获得了更高的荣誉，死后经过防腐处理做成木乃伊，抹上香油，放在玻璃罩子里供人瞻仰。

三十多年过去了，古巴的鸡蛋、牛奶和所有其他食品从来就没有取消过配给。到了90年代，甚至连食糖有好几年都要从拉美其他国家进口。❏

【更正】

《红波缘何再次来》一文最初发表在本刊291期上，作者是于向真。由于本刊编辑工作失误，不但293期又重发了此文，而且把作者误写为唐燕。特此更正，并向作者和读者致歉。

【本刊声明】

《记忆》创设于 2008 年 9 月，是一份面向民间，面向业余，面向老年的同人刊物。《记忆》非慈善、非公益。编者尽义务，作者无稿酬。凡认同《记忆》宗旨，成为本刊会员，遵守本刊规定者，皆可获得本刊。

《记忆》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宗旨，以不党、不卖、不私、不盲为刊训。遵奉众生平等，百家争鸣之精神，凡摆事实，讲道理的文字，无论何门何派皆可刊发。除特殊情况，本刊要求首发。所发文章，不代表编者观点。

本刊所载的文字、照片、图表等内容，均受国家法律和对中国适用之国际公约中有关著作权规定的保护。未经著作权人授权，任何人不得改编、转载、复制或为盈利的目的以其他方式使用本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

获得合法授权的，应在授权范围内使用，必须为作者署名，注明“来源：《记忆》第 xx 期”字样，并按有关国际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有关规定向著作权人支付费用。

违反上述声明者，本刊将依法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

联系：方惜辰，信箱：fangxc1966@gmail.com

林 洛，信箱：lereve1860@gmail.com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选摘、引用本刊文章，请注明出处

